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7年3月30日第88期（增刊）

本期目录

【天津文革专辑】

书海泛舟

- 王辉 著 渔歌子 选录 《天津文革亲历纪事》前言与目录
王辉 著 渔歌子 选录 万张集团冤案的由来（《天津文革亲历纪事》选读）
王辉 著 渔歌子 选录 造反者的悲剧（《天津文革亲历纪事》选读）
王辉 著 渔歌子 选录 王曼恬之死（《天津文革亲历纪事》选读）
林启予 口述 周新民、杨祁 整理 《尘封的岁月——林启予口述》
序、后记与目录
林启予 口述 周新民、杨祁 整理 《尘封的岁月——林启予口述》选读

【书海泛舟】

《天津文革亲历纪事》前言与目录

王辉 著 渔歌子 选录

选录者按：本篇及以下3篇均选自王辉著《天津文革亲历纪事》（台北市兰台出版社，2013年5月第一版）。为便于查阅，选录时将原书以尾注形式集中于书后的注释改为该注释处页面下端的脚注。原书中将“文件”错排为“档”，将“专案”错排为“项目”等明显差错均已订正。

前 言

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始于1966年5月16日，终于1976年10月6日，历时10年之久。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每个地区、每

个单位乃至每个人的历史都有相似之处，却又不尽相同。天津市的“文革”史也有自己的特点，其中市级政权的两次倒台就是重要标志。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全国自上而下地开展了夺权斗争，导致当时的天津市党政领导机关彻底垮台。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普遍开展了清查工作，当年天津执政的党政领导层又随之解体。

我长期在中国共产党天津市委办公厅工作，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担任市委文革办公室副主任（主持办公室的全面工作）；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我担任中共天津市委、市革命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并兼任市委清查办公室主任，因而亲历了天津市两届党政领导层解体的全过程。如果把当时的党政领导层比作一个人的个体，我亲眼目睹了他躺在病床上挣扎直至寿终正寝的全过程。当然我也和他们共患难，不能幸免地被解了职，自己那小小的“官位子”也“死亡”了两次。随着数十年岁月的流逝，“文革”的当事人大都已经作古。作为一个少有的见证者和幸存者，一种历史责任感驱使我把这两段史实如实地记述下来。我自问没有能力来对文化大革命作深层次的评价，但愿所记的事实能便于管中窥豹，以见天津乃至全国十年“文革”之“一斑”。

作者谨识

2013年3月1日

目 录

前 言

上 篇

中共天津市委、市人委倒台（1966—1967） 9

一、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农村整风整社 9

二、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四清运动 18

“四清”实际上是“文革”的序幕	19
著名劳模和黑帮头子	22
总支书记与土匪世家	27
流毒全国的夺权斗争	31
“四清”夺权探源	35
可怕的宁左勿右思想	39

三、刀光剑影的华北局工作会议	46
最最特别的会议	46
惊心动魄的开端	49
《老生常谈》起风波	53
四、斗争矛头指向当权派	58
深入群众遭批判	58
提小意见惹大祸	61
点火批判一把手	65
说说党内斗争哲学	70
五、市委工作会议狼烟四起	74
开开停停的市委工作会议	74
公开点名批判的第一人	78
「学习材料」成了「大毒草」	82
主管书记在劫难逃	86
说些真话遭批判	90
六、炮打市委司令部	94
七、市委文革办公室记事	102
短命的文革办公室	102
闻名全市的「八·二六」事件	105
「红色恐怖」的岁月	109
异乎寻常的社会流动	113
八、风雨飘摇中的市委	118
市委第一书记鞠躬尽瘁	118
半瘫痪的工作会议	123
转入地下工作的天津市委	127
震惊全市的三轮二社事件	131
九、在政治旋涡中挣扎	135
我为市委写检查	135

被“揪”的感悟	139
转移档案的风波	142
 十、万张集团冤案的由来	146
 十一、市委的最后一幕	153
 下 篇	
中共天津市委、市革委从重组到倒台	162
(1967 — 1978)	
 一、中央对天津「文革」一锤定音	162
 二、造反者的悲剧	169
造反组织的三个时期	169
中央十一次接见天津赴京代表团	175
「文革」最后的殉难者	186
 三、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194
参加起草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文件	194
中央批准天津市成立革命委员会	197
令人不解的几个问题	200
 四、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第一次改组	205
突如其来的绝密会议	205
中央首长接见	208
市革命委员会的改组	212
 五、「批陈整风」：一次巨大的冲击波	215
 六、旁观江青八次来津	220
 七、江青与天津驻军	225

八、江青三访小靳庄	229
江青一访小靳庄	229
江青二访小靳庄	236
江青三访小靳庄	239
九、江青讲「儒法斗争」	243
附录：江青在「天津市儒法斗争史报告会」上的讲话全文	248
十、江青在津批文	262
十一、且看江青的政治表演	265
十二、天安门广场事件的前前后后	269
周恩来逝世后的吊唁活动	269
清明节前的悼念活动	274
追查所谓「反革命谣言」	276
要害是抢先点名批邓	280
十三、华国锋来津的风波	285
十四、毛泽东逝世以后	289
十五、清查张春桥的叛徒问题	293
十六、市委、市革委在「揭批查」中解体	298
十七、王曼恬之死	309
十八、我清查和清查我	315
十九、永不过关的检查	321
准备检查的过程	321
检查的主要内容	324
所谓「捂盖子」的问题	335

二十、解学恭其人 342

资深的共产党高级干部	343
传扬刘胡兰事迹有贡献	344
深受中央器重的领导干部	346
在天津工作的几件大事	348
惟命是从、克尽厥职的领导干部	351
党内斗争的牺牲者	357

二十一、天津经济从未濒临崩溃的边缘 363

二十二、四十年回眸看文革 368

文革是史无前例吗?	369
中国第二次枪杆子夺权	374
文化大革命的文化特色	379
文革为改革开放开辟了道路	382

后 记 385

注 释 387

【书海泛舟】

万张集团冤案的由来

(《天津文革亲历纪事》选读)

王辉 著 渔歌子 选录

选录者按：本篇节选自王辉著《天津文革亲历纪事》（台北市兰台出版社，2013年5月第一版）上篇第十章。

凡是经历过天津“文革”的人们记忆犹新，天津最大的冤假错案就是所谓“万晓塘、张淮三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万晓塘原任市委第一书记、张淮三原任市委书记处书记。这个冤案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已彻底平反。这个冤案是怎么制造出来的？是谁首先揭发的呢？是学校红卫兵造反组织吗？当然不是。他们根本不了解情况。是市委机关造反组织揭发的吗？也不是。他们大都是各部委的一般

干部，并不太了解上层情况。是“四人帮”头子点名诬陷的吗？也不是。让我从万晓塘、张淮三在“文革”初期的遭遇说起吧。

万晓塘由于长期带病工作，极度劳累，心脏病突然发作，于1966年9月19日不幸逝世，前文已有专题记述。可是这样一个一心为公的优秀领导干部，去世后却被人造出“服安眠药自杀”的谣言，为日后诬陷他是万张集团的头子埋下了伏笔。

张淮三是“一二·九”学生运动时参加革命的老同志，1945年下半年受党的派遣，来天津开展地下工作，任中共天津工作委员会委员、秘书长，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冀中区党委城工部天津市内三人领导小组成员。1948年1月，他在津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经受严刑拷打、多次审讯，坚贞不屈，保持了共产党员的气节，保护了天津地下党组织。由于敌人得不到口供，没有证据，于5月被释放。出狱后，他根据党组织的决定，回到解放区继续投入革命斗争。由于张淮三有被捕的经历，市委某部委一位负责干部贴大字报揭露张淮三是叛徒，引起很大震动，尽管市委组织部有的干部也贴大字报澄清事实，否定张淮三是叛徒，但是在当年极左思潮泛滥下，“叛徒”问题难以洗清。地下工作者被捕后如被杀害是烈士，被释放则是叛徒，已经成为“左倾”的思维定势。

在万晓塘被诬陷为“自杀”、张淮三被诬陷为“叛徒”的情况下，已为制造一个“万张集团”冤案提供了有力的“根据”。谁首先揭发批判“万张集团”的呢？某市级大机关于1966年12月7日以“革命群众”名义贴出“炮轰天津市委，火烧万晓塘”的大字报，第一次提出“以万晓塘为首的宗派主义集团”。这张大字报曾被其它群众组织翻印传播。

也正是在12月间，张淮三接到通知被护送去山西太原参加会议时，遭到软禁，后又押解回津被“监护”起来。这一切都是在绝密情况下进行的。我当时作为在市委领导核心身边的工作人员也不得其详，只知道这是华北局的旨意，当然更不敢多问。12月上旬，市委第二书记赵武成接待市委机关群众组织代表时透露了张淮三的叛徒问题。1967年1月13日在市委各部委、文革办公室负责人会议上，赵武成首次提出揭发批判万张反党宗派集团问题。显然这不是赵武成个人或市委书记处的意见，而是来自上级——华北局的指示。事实上在1966年11月29日至30日，华北局书记处专题讨论天津文化革命问题，指出“天津市委半年来贯彻执行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十一中全会以后有了发展”，明确提出“万张反党宗派集团”问题，决定张淮三离职反省等等。

这样看来，揭发批判“万张集团”的决定似乎是来自于上面，来自于中共中央华北局。可是后来看到1967年4月7日“中央首长接见天津驻军及干部群众代表的讲话”才得知，当时起关键作用的原来是陈伯达。在这次接见中，周恩来

在讲话中指出：天津工作，伯达是长期关心的，蹲过点，农业在小站，工业在钢厂。首先揭发万张集团的是天津的同志，伯达看了他的信，注意了这件事，派解学恭同志去天津，将张淮三调离天津……。周恩来还指出：在天津，万张集团控制达七、八个月之久，执行和发展了刘邓路线，还不能把赵武成说成他们一伙的，还要他自己检查交代。陈伯达在 1967 年接见某大学造反组织时说：“刘邓路线在天津的忠实执行者代表是万张反党集团，千万不要忘记这个集团在天津的各种罪恶，要把批判刘邓的反动路线和批判万张反党集团结合起来。”

“万张反党集团”后来改为“万张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作为一个“集团”，当然不只是两个人，而是株连了一大批人。部分市级和部委领导人作为“骨干分子”，受到军事监护的 10 余人，各部委、区局还有一大批干部被冠以“万张集团”的“代理人”或“干将”受到揭发批判，基层党组织负责人被株连的更是不计其数，其中很多人和万晓塘、张淮三并不熟悉甚至根本不相识，也被拉在一起了。

1967 年春，社会上散布了多种揭露万张反党集团的组织系统图。我手头还保留有某大学造反组织印发的一份“组织系统分布图”，分为核心、内务、组织、宣传、工青妇、政法、统战、工交基建和财贸 8 个系统，共 46 人。其中内务系统有路达、李定、陶正熠、王左、王辉。为什么当年市委有好几位副秘书长和若干办公厅处长以上的干部，偏偏划上我们 5 人呢？只因为我们 5 人是接触市委领导最多的人。这里把鄙人列为内务系统成员真是高抬我了，在以往的传单中，我只不过被列为“黑秀才”或“黑爪牙”。大学造反组织怎么能列出这样的名单呢？部委的一般干部恐怕也列不出来，有人估计很可能是某些知情的领导干部提供的。

从“万张集团”冤案的由来使我深深感到，这场文化大革命，实质是自上而下地发动群众运动，藉以进行党内斗争，实现彻底打垮所谓“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目标。在运动初期真正起作用的仍是党内各级领导骨干，一般干部和群众不过是被运动、被愚弄的角色而已。

从 1967 年初以来，在“文革”揭批所谓“万张集团”中，由于张淮三是天津地下党学生运动的负责人，同时对上又联系到前北京市委刘仁（原华北局城工部部长），故株连了一大批地下党员。1967 年 4 月 7 日中央首长接见天津驻军及干部群众代表讲话时，康生插话说：“你们天津的同志对张淮三的走狗和爪牙还注意得不够，张淮三同前北京市委刘仁有很多很多联系，这是个很坏很坏的反革命分子，建议对万晓塘、张淮三、刘仁也组织调查团，很好地调查一下。”

对于康生的“指示”，不少人闻风而动。我看到就有两份对于天津地下党的“调查材料”。一份的标题是《彻底追查叛徒张淮三领导的地下组织》，副题是“挖出敌人埋下的定时炸弹”。这份“材料”是由四个工厂企业和两个学校联合搞的，

署名为“天津工人联合调查团”。“材料”中列出地下党员 122 人，其中在天津的有 77 人，在北京的有 22 人，在河北省的有 4 人，其它工作地点不详的 9 人。我解放前在天津虽然只是一般地下党员，居然也名列黑榜。“材料”里面提到的具体人名和工作地点，差错很多。一时间，我们都成了共产党内部的“定时炸弹”！某大学造反组织署名的另一份“调查材料”，标题为《绞死万张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直接后台彭真、刘仁》，并称是京津地下党城工部专集，列出建国前从中央晋察冀分局、冀中区党委、华北局城工部的领导干部到部分工作人员以及进入京、津以后地下党员担任领导干部的名单，说什么“地下党组织严重不纯，在城工部中，叛徒、特务受重用”等等。

天津地下党组织真是“严重不纯”吗？天津早期党的发展及党组织的建立，是在革命先驱李大钊的关怀培育下促成的。老一辈革命家周恩来、刘少奇、陈潭秋、蔡和森、彭真、邓颖超、林枫、姚依林、薄一波、刘澜涛等，都在天津领导过惊心动魄的革命斗争。从 1924 年 7 月天津有了第一个党的领导机关到 1949 年 1 月 15 日天津解放，天津地下党经过无数次的严峻考验，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地下党在解放战争时期，向解放区输送了大批干部，至 1948 年解放前夕，几个系统共有地下党支部 93 个、党员 1394 人，出色地配合天津战役，完成了党交给的迎接天津解放的任务，保证了天津市委进城和接管天津工作的顺利进行。“调查材料”还说刘仁在城工部时就曾讲过：“来的人里有一半不是特务就行”。这完全是凭空捏造。事实证明，那个时期来的地下党员没有一个是打入党内的特务分子。

当年不仅是对地下党进行调查，而且把地下党的骨干都列为重点审查对象，许多人受到揭发批判，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天津地下党“地方系”的领导骨干刘文、赵琪、李桐、孔昭慈等被诬陷为叛徒、特务，被关进监狱一年多。刘文、赵琪都是 1939 年参加地下工作的老同志，刘文是抗战时期的中共平京唐点线委员会在天津市建立的第一个党支部的书记。曾任天津地下党秘密交通的赵岩，解放天津时冒着生命危险把国民党城防图送到城工部，为天津战役作出重大贡献，竟然也受此案的株连，在杨柳青农场被关押一年多。这些人基本都在原河北省天津中学上过学，又使这个学校的一批地下党员、民青成员都受到株连，有的被迫害致死，有的被逼得精神失常……

在“文革”中，所有地下党员都无一例外地被审查一遍。我们市立中学（现在的天津市一中）地下党支部于 1948 年上半年在耀华中学、工商附中各发展了一名地下党员，有一段时间，我曾经负责联系过他们。为耀华中学马钺入党一事，有关部门找我调查过多次。马君在一个中学当校长，第一次找我调查，我证实他是共产党员，他因而当上了学校革委会主任。但他不久被撤下来，又找我调查，

逼我承认他不是共产党员。起因是当年发展马入党的人已去世，无法找到入党介绍人来证明。我说我接转过他的组织关系，某某人确系他的入党介绍人。调查者说，我们查过这个人的档案，他不是党员，怎么能介绍马钺入党？我说既然如此，还要我证明什么？他们一看不行，又拉上学校的“军宣队”一起来找我，上来先“打态度”，上纲上线，吓唬一番。这样僵持不下，我灵机一动，出了这样一个证明：“我当时确认他是共产党员，如果他确不是共产党员，则很可能是民青或进步群众，而我误认他是共产党员。”这个“如果”是假设的，犹如英语语法中使用过去式的虚拟语气，以这种语法表达的假设，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就这样，调查者居然接受了。后来找我调查工商附中王嘉禾入党又遇到同样的麻烦，因为王君和马君都是同一入党介绍人。我依照给马君写证明的方法如法炮制，又应付过去了。我知道，靠这样的证明是定不了案的。果然，后来有关调查者又都来找我，请我重新证明他们是共产党员。

屈原《九章·怀沙》云：“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凤凰在笱兮，鸡鹜翔舞。”从当年地下党的遭遇就可以看出，这场“文革”就是颠倒黑白的“革命”，就是变地下党为叛徒特务。当时的逻辑是，被国民党逮捕过的不是烈士就是叛徒，地下党员没有被捕也有特务嫌疑。一位当年参加地下工作的老干部被逼供无奈，拍案而起，质问办案人员：难道在现实生活中只有《红灯记》里的李玉和与叛徒王连举两种人吗？用这种逻辑观察处理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真是一种悲剧。

【书海泛舟】

造反者的悲剧

（《天津文革亲历纪事》选读）

王辉 著 渔歌子 选录

选录者按：本篇节选自王辉著《天津文革亲历纪事》（台北市兰台出版社，2013年5月第一版）下篇第二章。

我在这里不按人们习惯的说法，将“文革”初期起来造反的人称之为造反派，而只称他们为造反者，何故？因为起来造反的人们，事实上并没有成为真正的政治派别，尽管那时有许许多多的造反组织，但都是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跟随毛泽东起来“造反”的。他们打着同样的旗帜，呼着同样的口号，干着同样的事情，

这能说是不同的政治派别吗？

我认为，所谓“派”，可以有思想上的派别，就是有共同思想观念的人群，与他人的思想观念相冲突而形成一种派别；可以有政治派别，在政治上有共同的政见和利害。按照这个要求，审视在“文革”中蜂拥而起的造反组织，都构不成一派。他们只是对某领导干部的态度不同，是批还是保而形成对立的组织，即使因观点相同而相互串联、联合，也形不成一个政治派别。这场“文革”，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中央和中央文革直接指挥、以解放军为后盾的政治运动，各种群众造反组织，不过是适应当时政治需要的工具而已。

造反组织的三个时期

从全市范围讲，天津的造反组织兴起于1966年8、9月间，至1967年12月6日以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为标志，退出政治舞台，存在了不过一年零几个月的时间。有些造反组织的生命更为短暂，例如与“五代会”相对立的“天津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委员会”（即“大联筹”）于1967年7月15日成立，至11月22日解散，仅在世上存在了一百来天。

1968年全市各区、县、局，各基层单位革命委员会相继建立，造反组织已经全部解体。

天津市造反组织运动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1966年8、9月至1967年1月，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冲垮市委领导机构的时期。

从中央“五一六”通知开始，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掀起红卫兵运动，造反组织首先在大中学校以“红卫兵”的形式建立，如天津大学的“八一三”，是1966年8月13日成立的；河北大学的“八一八”，是8月18日成立的。他们开始是批斗本单位的当权派，批判市委执行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本单位夺权，冲击市委领导机关，直到1967年1月18日中共天津市委彻底垮台。

第二个时期，从1967年1月至8月，是批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造反组织相互内战的时期。

1967年1月14日至15日，在上海“造反派”发出“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后，天津市85个工人造反组织、学校“红卫兵”组织及北京造反组织驻津“联络站”，连续发出《紧急通令》和《紧急通知》，对天津市委“推行反革命经济主义，进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提出“严正警告”。¹

¹ 《天津市四十五年大事记》，（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页279。

这里说的只是 85 个组织，当时究竟全市有多少大大小小的造反组织呢？谁也没有统计过，可谓多如牛毛。1967 年 1 月我被一个造反组织揪到市委机关大楼里转了一圈，发现市委大楼里就有几十个挂牌子的造反组织。当时两三个人也可以成立一个战斗队，连“十几个人，七八条枪”都凑不起来，也叫什么“总部”、“总司令部”等等。但全市也形成几个比较大、有影响的造反组织，如天津大学的“八一三”、南开大学的“卫东”、河北大学的“八一八”、市委机关的“联委”、市公安局的“造反总部”、市劳动局第二技校和反修锦纶厂的造反组织以及“工矿造反总部”等。

当时市“夺权筹备小组”（后改为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简称革筹小组）和天津驻军支左联络站按照中央的要求，于 3 月 15 日至 22 日，先后召开了贫下中农、产业工人、市级机关干部、大专院校和中学红卫兵等五个系统的代表会议。这“五代会”自然是各个造反组织组成，例如干代会主要领导成员是市委机关“联委”和公安局“造反总部”的负责人。“五代会”成为当时执政者依靠的主要力量。

在这个时期，各个单位造反组织开过许多批斗会，不仅限于本单位的所谓“走资派”，而且扩展到本系统，例如财贸系统的斗争目标是“宋马赵”，喊得很响！宋是指市委分管财贸的书记宋景毅，马赵是马秀中、赵步崇，是市委财贸政治部的正副主任。实际上当时市政府也设有财经委员会，但其正副主任并没有被列为财贸系统前几名批斗对象，看来斗争的主要矛头还是对着党内的“走资派”。有些大造反组织，斗争目标则是市级领导干部。还有一些批斗会经常拉一些人陪斗。如果夫妻双方都担任领导职务，则将夫妻双方拉到一起批斗。听说一次批斗原副市长杨拯民（当年与张学良一起发动西安事变的杨虎城将军的长子），竟错把原市委一位书记的夫人（原市委工交政治部副主任）一起拉出来同台批斗，真是“乱点鸳鸯谱”。

在这个期间最大规模的批斗会，是 4 月 4 日至 9 日，天津市“五代会”和文艺、体育、新闻、财贸等系统的群众组织，分别举行万人以上参加的“批判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大会。最大的走资派是刘少奇，天津的代理人是万张反党集团。

这个时期天津也发生过几起武斗冲突事件，但是同全国各地比，天津的武斗规模并不大。全市范围发生武斗只死亡 6 人，天津中级法院认定在“文革”初期武斗死亡共 11 人，可能包括基层单位武斗致死的人数。这个死亡数字同其它省、市比，可能是最低的。从 1967 年 4 月以来发生冲突的事件有：

4 月 24 日，天津市“大联筹”三千余人冲击天津驻军支左联络站，至 28 日撤出。“大联筹”是天津职工队伍中与“工代会”对立的造反组织，他们到支左

联络站门前静坐，要求军队给予支持。

4月27日，天津大学、体育学院等院校学生，在天津大学发生武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天津市四十五年大事记》中记载：“天津大学、南开大学、体育学院、河北大学等院校学生，在南开大学发生万人武斗。”¹这与事实有很大出入。实际经过是这样的：在群众组织纪念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十周年纪念大会上，因市革筹小组成员胡昭衡出席会议，天津大学“八一三”和南开大学“卫东”两个组织当场反对。他们提出胡是“假党员”，没有资格参加会议。这就与保护胡昭衡出席会议的体育学院造反组织发生冲突，但未形成武斗。会后，体育学院的一些运动员拿着打棒球的球棒，乘大卡车到天津大学示威。体育学院的运动员虽然身体矫健，是武斗的能手，但是敌不过天津大学人多势众。天津大学的人将体育学院的车子包围起来，车上的人员也被揪下车来。

5月12日，天津铁路分局总调度室被砸抢，调度通讯设备被毁，部分值班调度人员被打伤并被架走，致使津浦、京山线铁路运输调度指挥中断25个小时。

2

7月7日，河北大学“井冈山”和天津市工矿企业无产阶级造反总部、工农学革命造反野战兵团等组织三千余人，打砸了天津三五二七工厂，烧了两辆救火车，在车间破坏、抢走了部分设备。工代会的负责人请示驻军支左联络站领导，将工人从工厂后门撤走，未发生人身伤亡。7月8日23时，陈伯达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天津驻军支左联络站负责人，作如下指示：“工厂是国家的财产，社会主义的财产，人民创造的财产，你们忍心破坏吗？请你们好好想一想。工人是老百姓，是国家的主人翁，你们可以用对待敌人的办法对待劳动人民吗？要把我的话贴到街上，贴到每一工厂。我上边的话是提醒受蒙蔽群众的。现场不要动，要由五个代表会议组织人去参观。”³

7月24日，高等院校的“天工八二五”等组织查封了《天津日报》，至9月17日复刊。

8月9日，“大联筹”组织攻打天津政治师范学校，火烧该校大楼。次日，“大联筹”又攻打天津六〇九军工厂。天津政治师范学校有两个造反组织，一个是红代会，是“五代会”方面的，另一个是红革会，是对立面“大联筹”方面的。双方发生矛盾，红革会把“大联筹”引来，制造了火烧学校大楼的事件，但没有把大楼完全烧毁。由于“大联筹”与站在工代会一方的六〇九厂发生矛盾，第二天下午“大联筹”又开始攻打六〇九厂。工代会则根据陈伯达和支左联络站的意见，

¹ 《天津市四十五年大事记》，（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页381。

² 《天津市四十五年大事记》，（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页281。

³ 天津市革命职工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革命职工报》编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1968，页43。

组织人员保卫六〇九厂。这是天津市最大规模的一场武斗，共死亡6人。8月11日20点，陈伯达、郑维山对六〇九厂事件作出指示：“你们（指攻打六〇九厂的“大联筹”）这样做是错误的，错误不要犯得太多了，第一次、第二次是可以原谅的，不要把自己引到没有出路的道路上。我们国家是大好的形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要搞好抓革命促生产，不要做破坏国家财产的事，不要上少数坏人的当，群众力量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是深入人心的，希望你们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¹

第三个时期，从1967年8月至1967年12月，是制止武斗，促进大联合，筹建市革命委员会的时期。

按照中央、中央文革的要求，天津市组织了一个由“五代会”和对立面“大联筹”共同参加的赴京代表团。从8月15日至12月8日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这个期间中央首长先后十一次接见天津赴京代表团。天津赴京代表团由天津驻军、干部代表和两派群众代表组成，开始10余人，后又扩大至约30人，开始是谈判制止武斗，之后是协商大联合，最后是协商筹建市革命委员会。

中央十一次接见天津赴京代表团

中央首长第一次接见。时间：1967年8月15日21时50分至16日1时。
地点：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参加接见的有陈伯达、谢富治（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及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等人，陪同接见的有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解学恭、江枫和天津驻军负责人杨银生（六十六军政委）。每次陪同接见均为这几个人。被接见的有双方代表。这次主要谈制止武斗，开始主要是“大联筹”的代表发言，讲六〇九厂武斗的问题，“五代会”代表也发了言。陈伯达、谢富治都不断地发言，批评武斗问题。“大联筹”面对面地同陈伯达、谢富治辩论。例如陈伯达说，天工“八二五”（天津工学院8月25日成立的造反组织，参加了“大联筹”）你们觉得乱得够了吗？天工“八二五”的代表赵健敏回答：我们是不希望乱的，乱不乱不取决于我们，而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是天津支左的问题，请首长注意六十六军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之一是下级服从上级，而且还存在着下级对上级特别是对党中央的盲目崇拜，像赵健敏这样普通的大学生，竟敢和中央领导人当面顶撞，也只是在“文革”特定的时期特定的情况下出现的。

中央首长第二次接见。时间：1967年6月16日22时至17日2时30分。
地点同前。当年人民大会堂建成后，由各省和直辖市自己布置一个厅。天津市因

¹天津市革命职工代表会议常务委员和会《革命职工报》编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1968，页44。

为当时刚刚改为省辖市，故还没有天津厅，至 70 年代初期才有了天津厅。这次参加接见的有陈伯达、谢富治及军方的李天佑、郑维山等人，被接见的有双方代表。这次继续解决制止武斗问题。陈伯达进场后先问大家：你们打电话没有？扣的人放了没有？双方在回答问题时，互相辩论，争吵不休。陈伯达说：昨天没有放的就算了，现在就放，12 点（指当日夜 12 时）前全部放完。不放就不谈判了，就散会。同意不？在双方都表示同意后，陈要双方各出三个人签字，中间休会，要两派打电话通知放人之后再谈。17 日 1 时 30 分继续开会，陈伯达同意双方各派一名代表、军管会出一名代表回去检查放人的情况，并要求双方协商拟定制止武斗的协议。天津形成尖锐对立的两派发生武斗，当地军队也制止不了，而必须由中央领导人出面调解，这让人难以理解，然而这就是当年真实的历史。

中央首长第三次接见。时间：1967 年 8 月 18 日 1 时 30 分至 4 时 30 分。参加接见的有陈伯达、谢富治、戚本禹及军方的李天佑、郑维山等，被接见的有双方代表。戚本禹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就在这次参加接见不久，因为揪“军内一小撮”触犯解放军，后来被抓了起来。“文革”初期同戚本禹一起上台的王力、关锋也因破坏文化大革命被抓起来，构成所谓“王、关、戚”事件。会议开始，陈伯达先问，昨天回天津去的人（即检查放人落实的情况）回来没有？并要求双方各出 5 名代表一起去协商制止武斗的协议。“五代会”和“大联筹”交替发言，发生争论。戚本禹讲话很严厉，说今天达成制止武斗协定以后，如再发生杀人、放火、打人，就把这个组织定为法西斯组织。可能是戚已得知揪“军内一小撮”引起毛泽东的反感，所以他在会上也讲到不能随便提揪“军内一小撮”，但已为时晚矣！会议最后由群众代表宣读了双方制止武斗的协议，全体鼓掌一致通过。

中央首长第四次接见。时间：1967 年 8 月 19 日 3 时 30 分。当时昼夜都颠倒了，中央所有接见都在晚间和夜间进行，真是夜以继日。参加接见的有陈伯达、谢富治及郑维山等，被接见的有双方代表。当陈伯达、谢富治走进会场时，群众组织代表起来鼓掌。陈伯达说，不要鼓掌了，不欢迎，鼓什么掌！不是为了让你们鼓掌的。认为鼓掌我会高兴，不会高兴的！谢富治插话说，不武斗，我们就高兴了。接见时陈伯达批评了前一天“大联筹”冲击“五代会”的游行队伍。“大联筹”的代表解释说，这不是有计划有组织的。谢富治问“五代会”：你们游行队伍有没有说刺激话刺激对方？（“五代会”回答：没有。）我替你们担心，可能你们控制不住你们的队伍……看来谢也是从中调和。谢还讲到“大联筹”的白金生不像三轮工人，白金生马上回答自己就是三轮车工人。像白金生这样的身份，不是产业工人，是不受中央领导人欢迎的，他后来多次受到批评。谢询问了白的历史后，对他说：你由集体工厂的工人到去蹬三轮，这是一个倒退，你必须承认这一点。无论如何，中央领导人和一个普通工人这样有来有往地平等对话，在平

时是不可想象的，也算是“文革”时期特定的一点“民主”吧。

中央首长第五次接见。1967年8月24日22时45分至25日2时。参加接见的有谢富治、郑维山等，陪同接见的除原有三入外，还有天津驻军的郑三生（六十六军军长）。会议通过了双方达成的抓革命、促生产的协议。会议还讨论了六四一厂协定、塘沽协议，双方在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执。郑维山讲了一段话之后，天工“八二五”的赵健敏质问郑维山。郑维山大声说：“你这是让我把刚才讲的话收回吗？难道强奸犯、抢劫犯就不要处置吗？”说完后因有事退席。谢富治说两派都缺乏自我批评的精神，先后三次领着大家读毛主席关于批评自我批评的语录。谢富治是1930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曾是赫赫有名的陈（赓）谢（富治）兵团的政治委员，于1972年病逝。（1981年被宣判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之一。）谢作为有多年丰富经验的中央领导干部，怎么调解两派的冲突竟然三番两次地读语录呢？这是因为，“文革”颠覆了往日的一切社会规范，当时谁也不能碰跟随毛泽东造反的造反派，他们可以“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这也是各级领导干部在“文革”中束手无策的根本原因。

中央首长第六次接见。时间：1967年9月8日零时50分至5时30分。参加接见的有陈伯达、谢富治、江青、戚本禹。陪同接见的有郑维山等，天津陪同接见的除原有三入外，还有萧思明（六十六军原政委）。会议开始，陈伯达、戚本禹先到的，先谈协议执行情况。“大联筹”的白金生要发言，陈伯达说又是你，算了吧，换一个！结果“大联筹”的赵凡和工代会的林启予简要说了执行情况。这时江青在谢富治陪同下进入会场，全场起立，高呼毛主席万岁！江青有个特殊身份，除毛泽东、林彪就是她，高居于其他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之上。她一出场就讲话，而且讲话非常富有煽动性，人们不由得就跟着亢奋起来。她讲话过程中人们总是不断鼓掌、呼口号。她说：“谢富治同志要我来看看同志们。天津市夜里有人出去抢东西，奸淫妇女，对这种东西要专政！（热烈鼓掌）我为什么说是‘东西’呢，因为他们是反动的。人民愤怒极啦！我们有责任。我们的军队宽大无边，对不对？（众：对！）但你们要支持军队，要发动群众，把坏人孤立起来。强奸妇女的这些人十分可恶，我都不好说出口。这些人要抓起来枪毙！（长时间热烈鼓掌，高呼‘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毛主席万岁！’）好！我看同志们是赞成的，因为这是广大人民的利益。要协助军队、军管会办好这件事，不要把军管会搞垮，把无产阶级的权威搞得威信扫地。军队的同志们腰杆要挺起来，不要怕他们。好，我还有事，现在退席了。”（大家鼓掌，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江青喊：“向同志们学习！”）江青走后，陈伯达、谢富治讲话，要“五代会”、“大联筹”都要检查自己，主要是批评“大联筹”，包括塘沽的问题和强占天津日报的问题等等。“大联筹”的人也不断插话作些辩解。谢富治提出：“最近总理、伯

达、康生、江青同志作了一系列的重要讲话。今晚讲完了以后，放放江青同志的录音。”果然，接见结束以后，大家听了江青的讲话录音。这里唯独放江青的讲话录音，可见其在“文革”中的特殊地位。

中央首长第七次接见。时间：1967年9月14日凌晨2时10分至5时40分。参加接见的有陈伯达、谢富治及郑维山，被接见的有天津市及石家庄、唐山、张家口地区群众组织代表，这些地方的驻军首长和干部代表也陪同参加。这次接见主要是继续促进大联合问题。陈伯达上来就高呼：在毛主席的倡导下，大联合万岁！群众跟着呼喊：在毛主席的倡导下，大联合万岁！陈接着说，今天就是一个大联合的会议，祝同志们大联合成功。陈先问，天津已经联合了没有？众答没有。陈作了长篇讲话，对“大联筹”有批评有表扬。“大联筹”代表说他们自己捉了28个坏人，陈伯达带头鼓掌，说你们做了一件好事。谢富治说，自己抓自己一派的坏人，合乎毛泽东思想。谢还问“五代会”抓了没有？“五代会”汇报说通过内部整风，大家交换了意见。谢富治在讲话中又强调要学习江青的讲话。他说：“最近总理、中央文革小组同志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指示，讲了很多话。特别是江青同志在9月5日接见安徽省群众组织代表时的讲话，大家听了没有？（众：听了）那是代表我们毛主席司令部讲的话，对当前文化大革命有很重要的意义。所以大家要好好学习这个讲话。”

中央首长第八次接见。时间：1967年9月26日0时27分至2时20分。参加接见的有周总理、陈伯达、谢富治及郑维山等，被接见的除了天津市还有保定赴京代表团。开始陈伯达未到，谢富治先讲话，表扬天津工人阶级联合起来了。谢讲话时问道：“大联筹”的赵——来了吗？赵健敏见谢富治叫不上自己的名字，赶紧答道：“来了。”谢说：老先生，你怎么不能联合呀！周总理问赵：你是按主席指示办事，还是以我为核心？赵说：我主张“五代会”内外造反派联合起来，我不主张以“大联筹”为核心，以“大联筹”为核心是错误的。周说：大家都听到啦！赵说：“五代会”加强扩大了，我们“大联筹”就解散。周说：你是天工的吧？天工一派是革命派，但你们不能否定“五代会”的革命派。周恩来还讲了很多鼓励天津工人的话，说自己“像我这样的人，快七十了，我还是要紧跟毛主席，学到死，改造到死，跟到死。”

当陈伯达进场后，群众起来鼓掌，周总理退席。陈伯达开头说一些鼓励和祝贺大联合的话，还说到保定协商气氛不如天津，说到此处他带头高呼：向天津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学习！众人齐呼：毛主席万岁！那是一个喊口号的时代，一个人一天不知要喊多少口号！当有人发言中称陈伯达“首长”时，他又说：“我是小小老百姓，我没有什么官名。你看我有什么官名？你们都是各个组织的勤务员，我连个勤务员都没有当上。”后来“批陈整风”时，陈伯达“小小老百姓”的说

法不知被人们批过多少次，其实这并不是什么实质性问题。“文革”初期，他接见群众代表最多，大都是说些促联合的话。据我所知，陈伯达在天津的主要问题，一是直接抓了小站地区的所谓三个反革命集团，再就是在制造所谓万张反党集团上起了重要作用，可是“批陈整风”时天津对他的这些原则错误都没有批，批得都不是地方。他那时之所以挨批，就是因为向林彪靠近了。

中央首长第九次接见。时间：1967年10月10日晚11时至11日凌晨4时20分。参加接见的有陈伯达、谢富治、郑维山等。这次主要接见的对象是天津的“大联筹”。如前所述，从1967年初旧市委垮台，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立和军队支左介入以后，天津各种造反组织形成了“五代会”和“大联筹”两大派，“五代会”是拥护和支持革筹小组和支左部队的，“大联筹”则是反对派。中央、中央文革和天津市革筹小组、支左联络站的目标是以“五代会”为基础，将“大联筹”吸收进来，促成大联合，尽快建立革命委员会。所以，陈伯达开始讲了一大段话之后说：“你们这里有没有赵健敏，赵健敏来了没有？你们到前面来讲嘛！听说你有一套意见，今天就是要听听你的意见，看你的意见站得住站不住嘛！”赵健敏讲了对9月30日政治协议的意见。陈伯达提问，赵回答，充分阐述自己的意见，“大联筹”几个代表也都起来说协议通过时不够民主。陈伯达挑拨说，有一种野心家想垄断天津，想随便玩弄天津老百姓！陈讲话时一再说“你们背后人操纵”，“你们抱着大石头，两三块、三四块大石头”，“抱着石头迷路了”。随后，一些造反组织就开始揭露“大石头”，例如说阎达开（原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后任天津市委第二书记，但没有上任）是天工“八二五”的“大石头”，只因阎当时被揪到天津工学院。事实证明，造反组织谁也没有抱着什么“大石头”，这不过是陈伯达无端猜疑。这次接见时间长，陈伯达、谢富治等人谈话很多。在陈伯达的压力和挑动下，“大联筹”内部发生冲突，先是赵健敏和工矿企业造反总部的程国富吵了起来，随后工矿造反总部的何光临站起来揭发赵健敏的问题。接着有人又说何光临是两面三刀，陈伯达则为何光临开脱。陈伯达、谢富治、郑维山等人都把主要矛头对着赵健敏。当场有人表示对赵健敏的问题不理解，陈说理解不了慢慢来嘛！有人表态说还要和赵一起战斗，陈问：你向谁战斗？答：走资派。陈问：哪个走资派？答：万张反党集团。陈说：你晓得万张集团的人在你们背后操纵吗？这样，陈伯达最终把矛头引向万张集团。其实哪里有什么万张反党集团的人在背后操纵？况且哪里来的万张集团？凭空捏造了一个反党集团，又把一切罪恶统统归之于这个集团，真是荒唐的政治酿造了一个荒唐的世界！

中央首长第十次接见。时间：1967年11月22日晨2时45分至5时29分。参加接见的有陈伯达、谢富治、郑维山等，被接见的有双方代表。当时天津赴京代表团住在北京，昼夜等候，随叫随到。陈伯达开场说：对不起，把你们从睡梦

中叫起来了，恰恰是今天我们在这里谈话有点时间。这次主要还是陈伯达讲话。陈伯达在历次接见中已经认识了不少人，他在讲话中首先提到“大联筹”在座的张承明。张是天津反修锦纶厂的工人，陈引导他说“大联筹”就是不好。陈还讲到小站的问题，刘秀荣要求发言，陈又批评了她。刘秀荣是小站地区一个小学年轻的教员，也是“大联筹”的，是与受陈伯达支持的小站四清中上台的西右营党支部书记王凤春对立的。陈质问刘秀荣：“你是受什么人委托？你是‘大联筹’的，你搞的恰恰是复辟！”刘马上进行辩解。在场的王凤春这时也帮腔指责刘秀荣。接着，南开大学“八一八”告“卫东”和“八一三”现在还围攻他们，“卫东”否认此事。“五代会”和“大联筹”双方代表发生争执。陈伯达对“大联筹”的白金生、赵健敏又一次表态，说：“白金生这个人我很反对。赵健敏来了吗？（赵：来了）赵健敏这个人我是反对他的。”陈伯达、谢富治反复强调贯彻执行毛泽东按系统大联合的指示，不赞成“大联筹”这样的跨行业组织。陈伯达多次点“大联筹”的名，说：“要把参加‘大联筹’的群众同头头区别开来，‘大联筹’有些头头搞了很多坏事，亲者痛，仇者快，他们做的坏事是不能容忍的，对一些头头做的坏事，参加‘大联筹’的群众不能替他们负责任。”这次接见，中央的态度很明确，就是批评“大联筹”，促使他们分化、解体。

中央首长第十一次接见。时间：1967年12月2日21时23分至22时58分。参加接见的有周总理、康生、陈伯达、江青、谢富治、姚文元、吴法宪及郑维山，被接见的有天津革命委员会常委、委员及全体赴京汇报代表团成员及天津驻军负责人。这次是宣布中央批准天津市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周总理主持会议，由工代会、农代会、大专红代会、中学红代会发言，林启予代表赴京代表团宣读邀请信，邀请中央首长出席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大会。开始由陈伯达讲话，又提到了赵健敏。周问，哪个是赵健敏，我认识一下（赵起立）。陈讲话后，康生、江青先后讲话，周总理最后讲话，开头用了较大的篇幅谈学习毛主席指示、读毛主席书的问题，还提出了文化界和公检法的问题，说：“江青在上月9号、12号有两篇讲话，天津没有反应（江青：天津搞了个防空洞，什么全国业余作者代表大会），背着中央文革，得不到你们的反应。江青同志去年11月在文艺大会上的讲话，今年也讲了，但根本没有什么反应。文艺、戏剧、电影、教育、广播、新闻，回去要查一查，为什么会这样，至少你们没有很好地抓，学校也没有什么反应，在抓叛徒上是有成绩的，为什么这方面不行？天津、北京很近。文艺界黑帮在北京活动，在天津也有，应该注意。”周还提到天津的公检法，说：“天津公检法是万张反党集团产生的重要基地，现在挖得还不深，以前天津在旧社会是个国内外反革命分子窝藏的地方，有很多租界，地富反坏右在那里活动，到现在还有他们的房产，剥削阶级在天津很多，叛徒天津也有人嘛！”仅从这段话就可以看

出，周的讲话也是够“左”的，而且把江青捧得那么高！当年的“文革”是黑暗的，可却是最透明的，中央领导这次接见的讲话很快公之于众。惟一没有公布的是周恩来最后对万晓塘自杀的说法表示怀疑，他认为当时并没有多么大的压力足以促使万晓塘自杀，让天津回去再认真查一查。¹

毫无疑问，中央领导人的十一次接见和表态，对天津“文革”的进程起了决定性作用。可是这些当年“推动”历史前进的人物却落得同样的下场，参加接见的领导人除了周恩来以外，几乎无一例外地分别被列入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甚至连郑维山、李天佑这样的高级将领也受到牵连；被接见的两派群众代表当年为了谁最革命争得你死我活，到头来也几乎无一例外地全部被列入“三种人”的名单，无论是“造反”的还是“保皇”的都受到“革命”的惩罚。

“文革”最后的殉难者

在今天大多数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中，恐怕“造反派”已经成了“文革”罪孽的两个最重要的集体记忆之一：上层是“四人帮”，下层则是“造反派”。在某种程度上，造反派成了诬陷、阴谋和暴力的抽象代名词，承担着“文革”中所有罪恶的大半责任。人们通常把“文革”称作一场浩劫，在浩劫中自然有大批人员蒙难。回顾一下运动的过程，运动初期受冲击的无非是这样几类人：（1）资本家。运动初期红卫兵扫“四旧”时首当其冲，被抄家、批斗；（2）知识分子。学校教师、各类专家、医生中的所谓“反动学术权威”，被批判、劳动改造；（3）各级领导干部，被当作“走资派”批斗、打倒；（4）地、富、反、坏、右分子以及政治历史上有问题受过审查的人，有些被遣送回乡。天津市共有 41571 人被遣送农村。这几类人后来都陆续落实了政策，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大多先后官复原职，失掉的都找了回来。唯独造反组织的负责人，在接下来的运动中不断受到整肃，例如 1970 年的“一打三反”运动，紧接其后的清查“五一六”运动。留在各级革委会中的屈指可数的原造反组织代表尽管早已洗心革面，绝对拥护重建的共产党统治秩序，而且除上海浙江等少数地方外，其它地方的前造反人物与“四人帮”并无组织联系，可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开展揭批查，几乎所有造反组织的负责人都受到清查，被提拔担任一定领导职务的都被免职，参加过武斗的受到刑事处罚。

从参加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的群众组织代表来看，当年都是积极响应毛主席、党中央号召投身文化大革命的，本身没有打、砸、抢行为，本来不应追究他们的责任。可是只要担任一定领导职务，就不可避免地被拉下马，甚至无端被开除党

¹中央首长十一次接见天津赴京代表团谈话纪要，均见天津市革命职工代表会议常务委员和会《革命职工报》编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1968，页 19-142。

籍。这里举一个典型例子：

巴木兰，女，1931年生，抗战胜利前在胶东解放区参加革命，1946年参军，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1955年转业到地方工作。她于1966年2月调市委工交政治部宣传处工作不久，“文革”就开始了。中央批评天津市委执行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当时市委书记谷云亨动员市直机关停止工作10天，集中进行揭发批判市委的问题。10天过后，她根据个人的笔记并综合工交政治部一些人的发言，写了两张揭发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字报，在市委机关内外影响很大。这是巴木兰在“文革”中响应中央和市委的号召，唯一的“造反”行动。实际上她在当时反对夺市委工交政治部的权，反对抄副处长以上干部的家，反对封市委交换台，在市委机关有一定影响，所以市委机关群众组织“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市委联委）成立时，她成为这个组织的“核心”领导人。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成立时，巴木兰作为机关干部代表被推举为常务委员，并先后担任过市文化局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市妇联副主任。想不到这便成了1985年5月18日开除巴木兰党籍的第一项罪名——“造反起家”。巴木兰被开除党籍的第二项罪名是“迫害张淮三同志”，只是因为她由组织委派曾在“万张专案组”工作过。第三项罪名是“攻击邓小平同志”，定罪的依据是别人交代在“批邓”时，曾与巴木兰说过：“邓小平上来咱们都得下去。”第四项罪名是“未能转变立场和认识”。在揭批查中，她被停职审查了7年，天津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于1985年作出结论和处理决定：“巴在‘文革’中造反起家，迫害张淮三同志，攻击中央领导人邓小平同志，后果严重。且至今未能转变立场和认识。同意开除其党籍。”

巴木兰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造反中只是按中央的部署参加“文革”运动，没有越轨行为。张淮三既不是她揭发的也不是她参加定案的，而是中央定的案，她只是参加过一段专案审查工作。那时参加揭发批判的人很多，搞专案审查又不是由她决定的，怎么能够据此给她定罪呢？至于攻击邓小平，她在1975年时任市委赴武清普及大寨县工作队队长，应召来市委参加部署批邓的会议后，回工作队没有传达贯彻，连带回来的批判材料都藏而不露，但是任巴木兰再三申辩，还是仅凭别人的一句话就给她定了罪！

在其后的岁月里，“造反派”的外延不断扩大，几乎成了一个集恶势力之大成的记忆公约数，囊括了“文革”初期的“造反派”和“保皇派”，大中学校里的红卫兵头头，1967年夺权中进入革命委员会的干部和群众代表，在“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中制造冤假错案的专案组的责任者，大都归入“造反派”的阵营。其结果是文革中错综复杂的政治迫害现象被简单化了，迫害的主要制造者——党和国家机器的责任被轻描淡写了。天津市在揭批查运动中，共逮捕33人。其中有军管干部也有老的局长，绝大多数是群众组织负责人。对群众组织负

责人的处罚，多为冤案。这里举一个典型例子：

林启予，1936年生人，抗日名将吉鸿昌的外甥。1965年天津大学动力系毕业，分配到市发电检修大队当实习技术员。“文革”开始以后，他在厂内组织战斗队。1967年2月开始参与社会上的造反活动。他一贯紧跟中央、中央文革和市革筹小组、支左联络站的部署，成立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时当选为工人代表。按照中央指示以“五代会”的形式组织大联合时，他成为“工代会”的核心领导人。1967年12月成立市革命委员会，他担任了常务委员。1969年11月，他主动要求去“6985”工厂（即筹建中的天津涉县铁厂），在那里工作四年并取得一定成绩。他于1973年入党，并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后来又调回天津筹备市总工会，总工会成立后又去组建天津地震局，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局长。天津市地震局刚刚组建，他主持工作就经历了唐山大地震的考验，没有出现重大失误，工作是有成绩的。

解学恭为第一书记的市委垮台以后，林启予以1978年10月2日被隔离审查，9日被捕。1979年底，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打砸抢罪”判处林有期徒刑10年。所谓打砸抢的缘由是这样的：1967年夏，与“五代会”对立的组织“大联筹”挑起武斗，形势混乱。“大联筹”打砸抢了三五二七厂之后，又围攻六〇九厂。在六〇九厂被围困时，市革筹小组及时上报中央、中央文革，陈伯达指示“攻打六〇九厂是错误的”，动员天津工人阶级保卫六〇九厂。林启予作为“工代会”负责人，响应中央和市支左联络站的号召，积极组织工人队伍保卫六〇九厂。双方在武斗中共死亡6人，其中六〇九厂一个工人因自制土炮失灵爆炸自毙，“工代会”一个开推土机（此推土机是夺得对方的）的工人被轧死。在支援六〇九厂途中，“工代会”一个工人被对方用小口径步枪打死。“大联筹”自己误杀一人。这样，“大联筹”没有攻打下六〇九厂，接着对该厂实行了军管。六〇九厂军管后，“大联筹”队伍撤回时又有两人被群众打死。法院不问是非曲直，就以他是“工代会”负责人，以“积极组织策划并调集武斗人员并亲自参加武斗”为由进行宣判。当时参加武斗的是“大联筹”和“五代会”双方，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大联筹”。可是法院的判决对“大联筹”的负责人，一般都判5年，而“五代会”的一般都判10年。为何如此判决？就是因为“五代会”的人员，在革委会成立之后得到了提拔重用，而“大联筹”的人员都靠边站了。你们是既得利益者，理应严惩。这里面包含着一种极端的复仇心理。据说有的“文革”中被关押过的领导人不分青红皂白地说：“我坐了多少年监狱，他们的刑期不能少于我，错了以后再说。”为什么像林启予这样一直紧跟中央、市委部署的人反而受到重刑处理呢？这里反映了形而上学的“左”倾思维，不是肯定一切，就是否定一切。中央决定彻底否定“文革”，把责任一股脑地推到江青“四人帮”身上，而地方上呢？

在“文革”时期的执政者首负其责，尤其是向参加各级领导班子的群众组织负责人算账。其实，这样做是非常不公平的。

如果仅仅因为他们当年执行的是中央、中央文革及市革筹小组、支左联络站等指示，因此就说他们都有问题，实在不足为凭。在“文革”中，他们都是共产党的执政者，不是国民党。你代表共产党在那里执政，按照中央和市委的指示办事，难道有什么原则错误吗？再进一步说，他们是毛泽东和党中央在其执政的特殊阶段所依重的政治力量，实际上是直接或间接地执行着毛泽东和其他“文革”领导人的政治意图。因此，他们在主观上是要维护这个体制，而不是颠覆这个体制。表面上看党政领导干部似乎是受害者，但“造反有理”的口号是毛泽东发出的，是他以党和国家领袖之尊，动员群众组织在他的领导下造各级党组织和政府的反。各级党政机关被毛泽东及其高层助手当作“夺权”的对象，但并不意味着这场夺权造反是平民反抗国家机器。事实上，在夺权的高潮时，毛泽东掌握着国家机器的最高权力，指挥着造反派为他夺取省以下国家机器的控制权。说到底，夺省以下党政机关的权实际上仍然是党的意志及国家行为的表现。林启予们的“罪名”是被人偷换了的概念。

再说，“文革”中的执政者是不是干的都是坏事呢？当然不是。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起码是清廉从政的，而且干了不少好事。天津1976年大地震遭到那么严重的破坏，几百万群众团结一致，战胜了重重困难，取得抗震救灾的胜利，没有党和政府的领导，怎么解释这件事情？应当说“文革”十年，正是靠着当时从中央到地方执政者同心戮力，才使我们党和国家安然度过了这场“浩劫”。而在当年的这批执政者中，既有领导干部也有群众代表，他们的初衷应当说是一致的。然而，“文革”结束后，执政者中的群众代表百分之百成了坏人，这从思维逻辑上都说不过去。当年是毛泽东和党中央号召群众起来革命，革命失败了，把责任推给群众，群众组织的负责人都成了“造反起家”的“三种人”。那么，又是谁让他们起家的？这不是他们个人的行为，而是共产党把他们培养提拔起来的，而今却成了替罪羊。有人写了这样一个对联，上联是“群众斗群众：最终遭殃”，下联是“干部斗干部：官复原职”，横批是“历来如此”。

不仅是被提拔的造反者受到处理，在“文革”中被提拔起来的年轻干部、劳动模范，也几乎都被审查、免职。“一朝天子一朝臣”，在天津凡是受到解学恭提拔重用的都受到牵连。当然也有例外，如某年轻领导干部，只因当年本部门的一把手是老资格又是反解学恭的，因此这位年轻的领导干部就被保住了，以后又得到提拔，最后当了市级领导干部。这一情况只能说明，中国至今基本上仍然是个人治社会。

揭批查之后，事情还未就此结束，1983—1989年间发动的“清查三种人”

运动，又把一场新的“清理阶级队伍”推向了全国。在“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时候，邓小平提出“文革”中的造反者是“最危险的三种人”。“说他们最危险，是因为：一、他们坚持原来的帮派思想，有一套煽惑性和颠覆性的政治主张；二、他们有狡猾的政治手腕，不利时会伪装自己，骗取信任，时机到来，又会煽风点火，制造新的动乱；三、他们转移、散布和隐蔽在全国许多地方，秘密的派性联系还没有完全消灭；四、他们比较年轻，也比较有文化。他们当中有些人早就扬言十年、二十年后见。总之，他们是一股有野心的政治势力，不可小看，如果不在整党中解决，就会留下祸根，成为定时炸弹。”¹为此，中共中央在1982年12月30日和1984年7月31日连续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清理领导班子中“三种人”问题的通知》和《中共中央关于清理“三种人”若干问题的补充通知》。什么是“三种人”呢？按这两个文件的解释，是“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一开始，这一运动还只是中共党内整党运动的一部分，但是很快就发展成了一个波及全国全民的政治运动。对全国高校参加过造反的学生，还特别“青睐”，于1983年4月23日向全国颁发了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期间高等院校学生造反组织重要头头记录在案工作的意见》。文件中说：“对‘文化大革命’期间高等院校学生中造反组织的重要头头和严重问题的人，应由原所在院校认真负责地将经过调查核实的材料，通知这些人现在所在单位的党组织和有关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门，记录在案。”“今后，凡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在校学生中选拔领导干部和选派出国人员，用人单位都必须主动与这些同志原所在院校联系，取得他们在校期间的表现材料。高等院校党组织应积极协助。”换句话说，这些被“黑材料”记录在案的年轻人成了隐性的“黑五类”，被打入另册。

同时，在清查“三种人”中，对老干部要比青年人宽得多。邓小平说：“老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不能叫‘三种人’。那个时候，不说违心的话行吗？有些事明明自己不赞成，不违心地去行吗？不能把那时在特殊情况下说过一些违心的话，做过一些违心的事的，也说成是‘三种人’。”²至于支左的军队干部，一般都没有事。如当年被指责为保解学恭的市委有关部门，其主要负责人是支左的军队干部，回原部队后谁也没有受到牵连。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极其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造反运动卷入了数以千万计的民众，决不是用非黑即白的“阶级分析”的套路可以说得清楚的。几十年过去了，历次政治运动包括反右派都得到了平反，而这类冤案却永无平反之日。今天提出造反者的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为他们“平反”的政治诉求，更不是要掩盖“文革”中造反派组织及其个人确实犯下的任何错误和罪恶，而是表明严肃的历史研

¹邓小平：《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1983年10月12日。

²邓小平：《关于如何划分和清理「三种人」的谈话》，1983年11月16日。

究的态度。历史的发展总是要有人付出代价，做出牺牲的，问题在于，是用这沉重的代价掩盖历史真相，还是用以换取真正的历史教训。

【书海泛舟】

王曼恬之死

（《天津文革亲历纪事》选读）

王辉 著 渔歌子 选录

选录者按：本篇节选自王辉著《天津文革亲历纪事》（台北市兰台出版社，2013年5月第一版）下篇第十七章。

在揭批查中，中共天津市委书记王曼恬于1977年1月自杀身死。这是当年市委领导层的一件大事，让我把此人沉浮的情况加以述说。

王曼恬是毛泽东大姨表兄王星臣之女，按辈分她是毛泽东的表侄女。人们都知道外交部的王海容是和毛泽东关系很近的亲戚，王曼恬则是王海容的叔伯姑姑。王曼恬是1938年从国民党统治区奔赴延安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干部。她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过，一直在文化部门工作，后来成为著名诗人鲁藜的妻子。天津解放时，她和鲁藜一起进城，解放初期曾在学校工作，后调入文化部门，在市文联工作过。她本人没有什么专业特长，只是在文化部门做党务工作，因为资格较老，行政级别定为13级，在当时已经属于高级干部了。1955年毛泽东点名批判著名作家胡风，自上而下开展反“胡风反革命集团”斗争，随之在各机关内部“肃清反革命分子”。鲁藜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王曼恬因此和他离了婚。

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是1967年12月1日成立的。当时是军队干部、地方干部和群众代表所谓“三结合”组成的领导班子。地方干部除了解学恭是中央派来的以外，原天津市的干部只有江枫、王亢之、范永中、王占瀛四人。市革命委员会正副主任四人，解学恭任主任，萧思明、郑三生（两人均为军队干部）、江枫为副主任。王亢之、范永中、王占瀛为市革命委员会常委。1968年2月，“二黑”事件以后，江枫被监护，王亢之自杀，范永中也受牵连被隔离审查。由周恩来多方筹划并经毛泽东批准成立的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才问世一个多月的时间，三个地方干部就都垮掉了。王曼恬当时凭藉她的特殊关系，向江青写密信告发天津的“二黑”问题，成了“有功之臣”。按照江青的旨意，王曼恬从此上台，担任中共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成员、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成立市委后又担任市

委书记。

她在 70 年代初期又调国务院文化组任副组长，来往于京津两地工作。她为什么到中央文化组任职呢？据吴德回忆，当年吴德兼任国务院文化组组长，由于把持文化组的于会泳等人都是江青的亲信，吴德工作起来很困难。当时万里给吴德出主意，可以把王曼恬调到文化组来。万里说王曼恬是王海容的姑姑，和毛主席是亲戚，能和毛主席见得上面、说得上话。有一次王曼恬到北京，吴德找她谈了这个问题，提出文化组要请她兼职，她在天津的工作可以不动，每星期来一两次参加文化组的工作则可。她说她本人同意，但要请示毛主席。吴德说那是不是就由你给毛主席写一封信，看一看毛主席有什么意见。后来，王曼恬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把在文化组兼职的事情报告了，毛主席同意。这样，王曼恬在京兼职，工作于京津两地。据吴德回忆，王曼恬在文化组表现还是比较好的，向毛主席反映了一些情况，帮助解决了文化组的一些问题。有几次于会泳、刘庆棠、浩亮等在文化组整人，王曼恬一说话，他们就缩回去了。¹

粉碎“四人帮”以后，于会泳等人接受审查，王曼恬不再赴京工作。在清查工作中，王曼恬的问题成为重点。从 1976 年 12 月开始，市委常委开会清理自身的问题，每次都是解学恭先讲，然后王曼恬讲。市委先后召开过六次常委会、常委扩大会议和一次全委扩大会议，让王曼恬讲清问题，她讲来讲去，一些问题始终也说不清楚。王曼恬这个人很“左”，对于清查她的问题思想抵触很大。1977 年 1 月 4 日下午，她在办公室服安眠药自杀。当年市委书记都在市委大楼小院内办公，每人一间小办公室，一张单人床，中午在办公室休息。那天下午上班多时，警卫人员才发现王的办公室紧闭未开，打开门后发现她昏倒在床上，立即送医院抢救，才没有死成。

为了防止王曼恬再次自杀，市委将王曼恬自杀未遂的情况和她的态度向华国锋、党中央作了报告，并提出对王曼恬实行隔离审查。报告发出后，市委随即指定由市直机关党委和市委警卫处负责人共同组成了 20 多人的看护小组，对王曼恬采取保护性措施。解学恭对看护小组提出三条具体意见：一是防止自杀，确保万无一失；二是政治上要划清界限；三是生活上要给予适当照顾。

1 月 10 日市委正式成立王曼恬问题调查小组，由我主持的清查办公室负责。1 月 18 日至 26 日，经市委批准，文化局、市直机关、文教系统、天大、南大等五个单位开大会对王曼恬进行面对面揭发批判。王曼恬于 1 月 22 日给解学恭写信，说批判和报纸文章的调子越来越高，再加上对她实行看护，她感到“精神上受不了”。1 月 27 日晚，王曼恬以和值班人员谈家常、讲故事的办法，麻痹了值班人员。8 时她向值班人员要了两片安宁片、一片安眠酮服下，8 时 15 分王熄灯

¹吴德自述：《十年风雨记事》，（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页 93。

并将门用方凳顶上。值班人员为防止意外，又将凳子搬开，将门半启。8时15分王睡觉不打呼噜引起值班人员怀疑，推门进屋见王没有动静，9时10分又拉亮电灯，见王用被子蒙着头仍无动静。9时40分，值班人员揭开被子见王脸色不好，怀疑其心脏病发作，找来医生检查发现瞳孔放大，呼吸脉搏已经停止，随即采取药物和人工抢救措施，但为时已晚。经医生、法医、现场检验人员确证，王曼恬死亡，是用一条毛巾和床单边缘布条勒在脖子上自缢身死的。

王曼恬自杀的当晚，市委书记王一、赵武成和我都分别赶到现场。王一当晚在家里已经服了安眠药，我们一起听值班人员汇报时，他情不自禁地摆着头。我是第一次看到自缢的，听说“吊死鬼”都吐出舌头，其状甚惨。可王曼恬只是脸色有些青紫，舌尖微向外吐，像因病而死的人一样安详。原来她将毛巾、布条的一头栓在床头栏杆上，一头往脖子上一勒，身子往下一滑就断气了。听说女一中以前有一位女校长，被审查时就是在床上用这种方法自缢的。王曼恬当时曾在该校担任教务主任，看来她是了解这种自杀方法的。无独有偶，时隔14年，1991年5月14日，在北京保外就医的江青也是用同样的方法自杀身亡。江青用几个手帕结成一个绳套，套在浴盆上方的铁架上，而后用被子和枕头垫在脚下。这个应该被王曼恬称作「表婶」的女人，也这样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王曼恬自杀身亡后，我和市委清查办公室的人员一起到她家清理她的信件等各种数据。令我深有感触的是，我虽然身为办公厅主任，在她生前却从未登过她的家门。她虽然主管文教工作，但是工作上我同她联系也不少，因为她这个人有时管得很宽，什么事情都喜欢过问。例如1975年秋一个周日的早晨，我正在家中休息，突然接到王曼恬的电话，说引河桥附近一家工厂的工业污水排入农田，要我马上去解决一下。我立即找市建委管治理环境污染的人，一起去现场察看解决。那时觉得王曼恬虽然水平不高，但在工作上敬业的，而且敢说话、敢负责。1973年国务院决定将河北省所辖的蓟县、宝坻、武清、静海、宁河划归天津市，这对于天津往后的发展非常有利。但在国务院尚未决定之前，这又是一件难度很大的事情。王曼恬受解学恭的委托，跑到国务院直接找李先念副总理，再三陈述理由，终于办成了这件事。

“文革”初期军队干部一统天下，各级领导核心主要控制在军队干部手中。因为王曼恬有特殊的政治背景，军队干部对她另眼相看，遇事也要让她三分。

当年我们查出，王曼恬自1968年3月到1976年10月给江青等人的信件33封、电话记录23份。她的主要问题，就是上述向江青写密信制造了所谓1968年“二·二一”事件，后果严重。其次是由于她在中央文化组兼职，经常给天津传些上边的小道消息，特别是1976年她积极鼓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再次就是她对江青以及中央文革的一切指示积极紧跟。当时市委把王曼恬定为“四

人帮”死党，并把王作山、张继尧、陈相文列为王曼恬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现在看来根据都是不足的。我们评价一个人，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当年几亿人都对毛泽东狂热地崇拜，王曼恬肯定要比别人更多几分愚忠。毛泽东逝世时，我见到她比任何人都要悲痛。说她跟着江青积极参与“评法批儒”，反对周恩来，其实在周逝世的时候，我见到王曼恬也是伤心流泪的。可是在清查中说王曼恬“疯狂地反对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显然是“欲加之罪”了。

“文革”之后，毛泽东受到牵连的亲属还有他的侄子毛远新，女儿李讷，姨孙女王海容。我从一些媒体上了解到，现在他们都和普通人一样生活，失去了神圣光环的笼罩，放飞的是心灵的自由。如果王曼恬能够熬过那段日子，活到今天，她对当年所发生的一切，又该怎么看、怎么想呢？

【书海泛舟】

《尘封的岁月——林启予口述》 序、后记与目录

林启予 口述 周新民、杨祁 整理

《昨天》编者按：《尘封的岁月——林启予口述》于2011年自印。

林启予，1936年生，天津人。其父早逝，姨父是著名的吉鸿昌烈士。文革爆发前林启予从天津大学毕业分配到天津市电业局发电设备检修大队电机中队任实习技术员。文革中参加造反后曾任天津市工代会核心组组长、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常委。1969年任6985工厂（天津涉县铁厂）建设工程副总指挥。1973年任天津市总工会副主任并加入中共。1975年1月出席第四届全国人大会后任天津市地震局局长兼党的核心小组组长。文革结束后“揭批查”运动中被开除党籍。蒙冤入狱。1979年12月27日（赶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正式实行之前），在尚未罢免其全国人大代表和天津市人大代表资格时突击审判，判处其有期徒刑十年。1988年1月（以文革中参加学习班时间折抵刑期后）提前释放。后曾经商。

序

王端阳

凡是在天津参加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对林启予这个名字一定不会陌生。他当

年可是个风云人物，当过天津市工代会的头、市革委会常委、市地震局局长。四人帮粉碎后，在“揭批查”运动中，他又入狱十年。不管从正面或反面来说，他在天津都是一个“了不得”的人物。

我从不讳言，文革初期我也是一个狂热的红卫兵，造反、破四旧、抄家、砸教堂、大串联……什么都干过。那时还不知道有个林启予。后来我们“犯错误”，逍遥，逐渐离开了历史舞台，直到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而工人阶级走上了政治舞台，成了文革的主力军。这也符合毛泽东的战略部署。这时我就听说了林启予，而且我的许多红卫兵战友和他很熟，也经常谈论过他，可我和他却无缘相会。

时间一下子跨越了四十多年，我也开始反思文革。从2006年开始，我相继在北京的“七九八”举办了《1966·教堂》摄影展，展出了我于1966年8月拍摄的红卫兵砸教堂的照片。接着我又连续出版了我的《一个红卫兵的日记》和我父亲的《文革日记》。这些书我都分发给了天津的相关人员，自然也传到了林启予的手里。在朋友的撮合下，我们在他的家里见了面。

见面当然离不开文革的话题。他给我详细谈了609厂武斗的情况，这在当时可是震动全国的事件，陈伯达亲自参与处理。我当时虽也听说过，但他以当事人的角度谈，而且有那么多的细节，确实令我吃惊和震撼。

我问他，这些东西记录下来没有？他说没有。我说为什么不整理出来？他很直爽地说自己不想弄，希望我来帮他写。（下图：林启予〔左〕和王端阳合影于2010年。）

这给我出了难题。经过思考，我表示可以帮忙，但有个条件，就是一定要自己亲身经历的，要真实的，尽量不加评论的。因为文革中的是非很复杂，我们说不清楚，还是让历史学家去评论好了。我们只是提供我们所看到的历史真实就够了。他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于是就定了下来。



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必须拿出整块的时间才行，而我那时正忙于整理我父亲的七卷文集，人又在北京，实在无法分身。前后拖了一年多，于是委托给杨祁和周新民。事实证明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当我看了他们的文稿后，觉得特别欣慰，这件事终于有了一个圆满的结果，我也对得起林启予的重托了。说实话，拖了这么久，我对林启予还是有点内

疾的。

林启予的这个口述，有大量的历史细节，而且涉及了许多历史人物，如周恩来、陈伯达、谢富治、康生、江青、王曼恬、姚文元、郑维山、戚本禹、杨成武、闫达开、胡昭衡、李雪峰、解学恭、张淮三、刘政、江枫、郑三生、华国锋、杨拯民等等。别的我就不多说了，光从这个名单，就可以感受到一种历史的厚重。我认为这个口述为研究天津的文革史填补了一个空白。特别是今天，当我们跳出了历史上的“派性”，以一种完全解放的思维来重新审视文革时，其价值就越发显现出来。

同时，我也惊叹林启予的记忆，我问他你怎么记得这么清楚？潜意识中我确实担心有不实之处。他说，在监狱中的十年，没别的事可干，每天都在想这事，想了有几百遍。这让我信服。

我也希望其他有相同经历的人能把自己所看到的写下来，即使不同也没关系，因为每个人的视角都是不同的。我曾经引用过“瞎子摸象”的典故，只要每个人把自己“摸”到的如实描述出来，合在一起，就是一只“全象”了。

2011 年 4 月

后 记

我已进入古稀之年了，自己十年冤狱总应该给子孙后代有个合理的交待，别让影响子女前途的事再延续下去。若有有生之年党能为我圆满地解决十年冤狱之苦，将是皆大欢喜，若没有解决，我也应留下这会说话的真实文字给自己的子孙后代，以免遗憾。

在此，衷心感谢王端阳同志为“林启予口述文革”（1966 年至 1988 年）一书写序言，还衷心感谢周新民同志和杨祁同志帮我整理的 20 多年来的真实纪实。后记部分是个人案件的事，由自己执笔，和他人无关。

林启予

2011 年 4 月

目 录

序（王端阳）

一、关于我

- 二、造反的缘由
- 三、卷入文革大潮
- 四、中央首长的 11 次接见
- 五、进入市革委会
- 六、离开五代会
- 七、造反的结局
- 八、十年监狱生涯
- 后记

附录

一、2010 年 6 月 5 日向党中央和市委呈上申诉书

二、2010 年 12 月 6 日向人民检察院送交的“渎职诉求”。诉讼的对象是：原市中法院邵牧岗审判长和原市高法院审判长牛湘龄及审判员林筱成、刘彦荣的渎职行为并附市检察院《刑事申诉审查结果通知书》

三、2011 年 1 月 3 日向全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再诉求渎职”，诉讼对象如上，及有关证据

四、2010 年 12 月 6 日关于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所获河西法院、市二中院的判决与裁决及向市政协的申诉

【书海泛舟】

《尘封的岁月——林启予口述》选读

林启予 口述 周新民、杨祁 整理

一、关于我

我是 1936 年在天津出生的，一直生活在天津。老家是甘肃省定西县。我姥爷是兰州当地的一个土财主，姥姥只生了两个闺女，因为没有生儿子，被姥爷遗弃。姥姥自己把两个女儿带大。把大女儿胡云英嫁给了定西师范学校校长林少文，也就是我父亲。父亲当时在烟台海军学校读书，即将毕业，奶奶因怕他毕业后不回家，就把他骗回老家，给他娶了媳妇，不让他走了。爸爸念过书有学问就当校长。后来西北军开进兰州，西北军中有个军官是爸爸当年的同学，见到爸爸说：“当什么校长啊，当兵吧。”于是介绍他进了西北军，刚好就在吉鸿昌的部队当了少校参谋。吉鸿昌当时是旅长，还没结婚，由爸爸牵线做媒，把小姨介绍给他。

经姥姥同意，把二女儿胡红霞嫁给了吉鸿昌。吉鸿昌就是我的姨父，所以林家与吉家有着很深的渊源。后来吉鸿昌当了省主席，为了避嫌，不愿意让我父亲在其手下干，就介绍他去孙连仲主席的手下，当了县长。

蒋、冯、阎中原大战，最后以阎锡山倒戈，西北军溃败而告结束。吉鸿昌所辖部队被迫接受蒋介石改编，成为二十二路军，紧接着被派往潢川，围剿鄂豫皖苏区。吉鸿昌是有名的常胜将军，基本上没打过败仗，可 1929 年他在河南剿共，和徐海东的部队打了一仗，结果大败而归。“这红军到底是个什么样的队伍呢？”他感到不可思议。经军中地下党的策划，于是一天晚上他化装穿便衣跑到共产党那边一看究竟。从此以后他拒绝剿共，有心起义。蒋介石一直在拉拢吉鸿昌，送了好多钱、物给他，但又对他心存戒备，派心腹冷欣（军统特务）潜入吉鸿昌的部队，收买了吉鸿昌下属的两个师长。吉鸿昌一共有三个师，现在两个师不听调令了，起义的事情也就泡汤了。接着蒋介石又强迫吉鸿昌“携眷”出国考察，意思是出了国你就别回来了，实际上把他给撤职了。

1930 年吉鸿昌在天津法租界霞飞路买下一座小楼，当年便举家从兰州迁到了天津。在兰州时我们家是姥姥当家，姥姥去世后，林、吉两家始终住在一起没有分开。到了天津仍生活在一起，一直到解放后。我父亲到了天津后，吉鸿昌忙于抗日前线事务，顾不了家，我父亲实际上成了这个家的管家。1932 年 2 月，吉鸿昌回国经上海到天津，在上海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回津后积极组织抗日救亡活动。1934 年 11 月 9 日，吉鸿昌在国民饭店 38 号房间遭军统特务暗杀受伤后，被法租界工部局逮捕。当天晚上，父亲和我姨母去巡捕房探望，吉鸿昌对其妻再三嘱咐：“红霞，不要到处托人花冤枉钱，好好教育子女。”临走时，父亲也被工部局当场逮捕。其原因是：在国民饭店是以父亲的名义开的房间，父亲自然逃不了干系。11 月 10 日至 14 日吉鸿昌被关押在法租界工部局，迫于国民党政府的压力，吉鸿昌被引渡给北平军分会，父亲也一起被送进了北平的陆军监狱。11 月 24 日姨父吉鸿昌英勇就义，时年 39 岁。行刑的那天，父亲也被带到刑场陪绑。在刑场上，吉鸿昌以树枝代笔，以大地为纸，写下了流芳千古的就义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这首诗及吉鸿昌将军就义时命令行刑的官兵给他搬个椅子，坐着面对面开枪的壮烈情景，都是我父亲林少文亲历并记录了这一历史时刻后，从监狱中传出来的。吉鸿昌就义后，父亲被移送到南京宪兵三团关押，在押期间受酷刑而得了肺病。又因主管他案件的军官是他在烟台海军学校的同学，没查出他是共产党，就保释回天津了。父亲于 1942 年死于天津市和平区营口道仁和里 24 号（此时吉、林两家从法租界霞飞路小红楼搬到此处，小红楼出租了）。

天津解放后，军管会贴出布告寻找吉鸿昌的亲属，姨母带着吉鸿昌的遗书和

《就义诗》去了军管会。军管会副主任王世英接待的，经确认后由政府每月供给七袋面粉供养全家，并为我母亲和姨母安排了教育工作。因姊妹同是兰州女子师范学校毕业，我母亲就在河北省师范附小做了教师，我和弟弟随母亲在此校读书。

我于 1952 年至 1958 年在天津一中学习，高中毕业后，由于出身好，在校是学生干部，曾担任过团委委员，学生会主席，被保送到天津大学动力系发电专业。当时天津是河北省的省会，为筹备第一届全运会，我又被借调到省手球队。全运会结束后又回到天大学习，所以 1965 年我才从天大毕业。毕业后，分配到天津市电业局所属发电设备检修大队电机中队为实习技术员。

二、造反的缘由

我所在的电机中队，电动机班组长是耿成民，也是我的师傅。这个人三代老工人，出身很好，但孩子多，而且都是男孩子，负担重，家庭生活比较困难，在节粮度荒时粮食不够吃，有点小偷小摸的毛病，偷点黄油啊、轴承啊、铜啊等等，卖点钱好买粮食。在四清时已经作为一般问题有结论了，他也因此受到过处罚，在同时期进厂的工人当中，他要比别人少一两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十六条”一公布，单位也开始组织学习，我们中队就抓了他的典型。

我们班还有一个人叫朱光海，是个贪污犯，他原来是农电处的保卫科长，支农的时候贪污了一万多块钱，在当时算是大数了。四清的时候工作队队长苏敏（赵武成的夫人，原天津市工交政治部主任、天津市委派驻天津电业局四清工作队队长）找他谈的话，说这是最后一次找你谈话，两条路，一条是坦白交代，退回赃款，另一条就是逮捕你。结果他坦白了，钱倒是没花，全退赔了。处理结果是免于刑事处分，保留党籍，下放劳动。正好就分到了我们组。文革一开始，他就成了我们电机中队党支部书记的一杆枪。

我是个学生，历史也比较清白，学生时期又是个活跃分子，我总觉得他们批斗的矛头不对，和中央公布的“十六条”精神不符。我师父的问题算个嘛，四清都结论了，你们折腾他有嘛用呢！就和朱光海顶上了，两边都用毛主席语录展开辩论，贴大字报，越顶越大，最后竟演变成了全大队的大辩论。当然他们也给我造了些谣，说我爸爸是出卖吉鸿昌的叛徒等等。这不可笑吗？吉鸿昌是明摆着的共产党员，这连蒋介石都知道，还用得着别人出卖吗？！

从大队辩论回来，我们就在班里成立了一个叫做“只争朝夕”的小战斗队，四五个人，都是同情我的年轻人，还没出师的学徒工。当时我们的活动还只限于单位，没有到社会上去。三轮二社事件、万晓塘的死……我们都没有参加。大概到 10 月份以后了，红卫兵高潮都过去了，天津大学的学生到我们单位串联，他

们听了双方辩论的理由，然后公开表态，支持我们的观点。学生一介入，全大队其他组织的观点也都倾向我了，很多班组也都成立了造反组织，我就翻身了，成了大队的红人。但我没管过全大队统一的造反组织。这时电业局成立造反联合总部，我在单位也算是小有名气了，就把我调到电业局造反联合总部，当二把手。一把手是白长福，他是搞测试的，还有用电的、发电厂的等等，组成了电业局的造反总部。这时我的造反历史就到了局里，还没有进入社会。

当时天津总的造反格局是以大专院校来划分的。虽然也成立了天津市大专院校联合造反总部，都承认自己是造反的，但内部已经开始分化：天大八一三、南大卫东这算一个大山头，河大八一八为一派，天工八二五为一派，实际上已经有了分裂的迹象，成三足鼎立之势。这和北京的形势有关。我们单位要走向社会，奔哪个“山头”呢？天津大学是工科院校，跟企业的联系比较密切，天津又是传统的工业城市，因此这派组织在天津的工业系统势力强，到我们系统来串联的又都是天大八一三的学生，于是我就成了外派的联络官，跟天大的“山头”挂上钩了。

这时天津的形势是考虑怎么夺权了。当时全国夺权有好几种模式：一种是青岛的模式，先夺权，后表态；一种是贵州模式，叫联合起来，按行业夺权等等。在天大八一三支持的企业内部也有两种观点，一种是以白金生为代表的，主张先夺权，然后争取部队的承认。白金生是荣复转退军人联合造反总部的头儿，他的观点得到了解放军运输学院（简称后字 253）造反组织的支持。我们在化工局礼堂辩论过一次。我也发言了，我这个人爱说，我主张：先联合，后夺权，叫人承认以后再夺权，你要先夺权绝对失败。那时候我还不认识八一三、卫东的头头脑脑，但是我的观点得到了他们的认同。在社会上学生虽然出名，但是得打工人的旗号，再加上我的单位好，电业局、产业工人、吃香，所以那次辩论会以后就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政变”，原来八一三山头的工人代表是白金生，被换掉了，我就成了这个山头的工人代表。

1966 年 12 月底的一天，张承明挑头干了一件事。张承明是何许人也？他是反修锦纶厂（化工局所属企业）的造反派头头。文革开始时最早起来造反的学校是十六中，最早给市委贴大字报的学校是“劳二半”，第一个给市委贴大字报的工人造反组织就是反修锦纶厂，张承明是个响当当造反派。那一天他联合了各大单位的造反组织，下午两点半在体育馆批斗张淮三，并让解学恭、胡昭衡来参加。没想到到会的人员太多，都上万人了！坐落在成都道和贵州路交口处的老体育馆根本装不下，批斗大会又临时改到民园体育场。等把人都组织好，已经是下午四点多，可张淮三还没有到场。找胡昭衡要人，没有。僵持到五点半多，天都快黑了，胡昭衡站起来了，他在主席台一进门的一个水泥台上开始讲话：“我跟你

们说，今天你们批斗不了张淮三。”他停顿了一下后，转了个话题说：“现在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中央已定了，从1967年的元月一日起，天津市由省辖市升格为直辖市！第二，中央已经任命解学恭为天津市委第一书记、阎达开为第二书记。第三条，我告诉你们实话，张淮三现在太原监狱关押。”可是与会的群众坚持要批斗张淮三，解学恭就和造反派的头头们商量，让他们派个代表，和公安局的人一起，把张淮三从太原押回来，然后再批斗。张承明是批斗大会的召集人，于是就派张承明和市公安局的人一起去了太原。把张淮三押回天津后，没有关在天津监狱，而是直接带到了反修锦纶厂，以后再也没有人提出开批判会的事。

我后来是听解学恭说，张淮三被关进太原监狱一事和江枫有关。1964年，全国都开展了政治大讨论，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在此期间，天津市成立了一个“审干办公室”，江枫任办公室主任。他们从公安局现存的解放前伪警察局档案中，发现了张淮三曾经被捕过的线索。当时抓捕张淮三的是天津市伪警察局，情况汇报给上峰之后，还没来得及审问，第二天张淮三就被军统局的人给带走了。时间不长，军统局就把人给放了，扣押在伪警察局的贵重财物也都悉数退还。从伪警察局档案中看，只有逮捕张淮三的手续，但没有审讯笔录，到了军统以后的情况也没有留下任何线索。因此张淮三就有了重大嫌疑。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此情况不知通过什么渠道反映到了中央，康生下令隔离审查，放在天津不放心，就把他关押在了太原监狱。

1967年初，全国出现了夺权的势头，这时候天津又发生了一件大事：1967年的1月21日，造反派把公安局的权给夺了。这是群众组织自发的夺权行动，参加的组织很多，主要是公安局内部有个组织叫政法公社挑头干的。后来解放军介入，第一项任务就是宣布公安局军管，军管会主任是刘政（他当时是六十六军的参谋长，支左代号是三号）。其他群众组织撤出，把夺权定为反革命夺权，只把政法公社定成反动组织，其他的群众组织全解脱了。公安局内部还有一个多数派叫公安造总，是支持江枫的。这件事情事先我不知道，事中也没有参加。这以后支左就分系统全面展开了，有支工的、支农的和支学生的，三支两军开始介入。

军队支左介入以后，就开始酝酿全市的大联合。第一次开会是在天津宾馆。参加会议的有五个山头的代表，分别是：我是一个，还有天大的杨长俊和南大的于泽光，代表天大八一三；反修锦纶厂造反派张承明和劳二半的郭长年；河大八一八的张崇俭和新冶金的代表王洪章；侯振江代表公安造总；干部代表是巴木兰，巴代表市联委。三个地方领导：解学恭、江枫、胡昭衡；三个军队领导：郑三生、杨银生、萧思明。就这些人开会，研究天津市怎么联合。张承明的观点是：主张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的大联合，凡是造反派都要联合。我的观点比较倾向贵州的联合模式，主张按行业、按系统的联合，好操作。会上只有我们两个人发言，

别的人都没有表态，会议也没有最后的结论。事后支左联络站又出头组织，按照张承明的意见，在全市找了 28 个单位（系统）的造反派，在民园体育场开大会，公开亮相，地方领导是解学恭、江枫、胡昭衡，军队的领导萧思明、郑三生、杨银生等都出席了，张承明是大会执行主席，我负责大会组织。会上宣布全市的造反派大联合，散会以后在和平路举行游行，军队在前边开路，搞得轰轰烈烈，这算是天津市第一次三结合雏形的亮相。

这以后清净了好长一段时间，没了动静，各回各单位闹革命。我还在联络站办公，地点在常德道 2 号。大概有一个多月，到了三月份，突然又来指示了，说周总理指示，让天津成立革命委员会夺权筹备小组，又把我们叫到宾馆。早晨八点去的，这回单位多了，不是 28 个了，而是 32 个，单位也略有变化，增加了歌舞团东方红蒙建农，增加了农民代表：东郊的翟殿柱，南郊西右营的王凤春；按系统的代表也多了。大学四个，天津大学、南开大学、河北大学、天津体育学院，没有了天工八二五，这时八二五已经被边缘化了。会上宣布成立天津革命委员会夺权筹备小组，筹备小组由 15 个人组成，军队领导三个名额，地方领导三个名额，群众组织代表 9 个名额。

接下来是分组酝酿。可就在这个时候，天大、南大开始揭发张承明，说张承明是保张淮三的，把张淮三押回天津以后不交给群众批斗，搁在厂里好吃好喝好待遇。张承明本来已经是亮相的人物了——工人、党员、转业军人、最早造反、民园三结合亮相大会的执行主席……进筹备组非他莫属。可经天、南大这么一折腾，他的威信大打折扣。支左联络站在大会组织方面由于考虑问题不够周全，会议偏偏组织了大小会交流，充分酝酿，这样一来，个别小组对张承明的意见就传播开了，所有的代表都知道了。选举又采用了全员无记名投票方式，投票的结果，38 个代表，张承明只得了 17 票。我得了 26 票，名列第一，进了筹备组。选举出来的三个工人的名额没有一个是纯粹工人：一个知识分子，就是我；两个是干部，孙长瑞是二轻系统的政工干部，王洪章是冶金系统的宣传干部，张承明落选了。后来天津就有了一个典故：康生第一次接见三派群众组织时讲了一句话：“看起来选举不如协商。”就是针对张承明落选这件事的。当时军队应该先拿出一个名单，让大家讨论协商，还有进退的余地。可是一选举，完了，一唱票谁也没治，板上钉钉了。就这样我进了革委会筹备小组。

三、卷入文革大潮

我当选了筹备组成员之后，就去河北宾馆（现在叫天津宾馆）办公，筹备组临时设在那里，那儿给了我一间办公室。过了些日子，是在 3 月份吧，周总理又

指示：天津市要做一个试点，成立五代会，即工代会、干代会、农代会、大专院校红代会、中学红代会，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大联合。因此组织筹建工代会的任务就交给我了，筹备组领导给我一个礼拜的时间。五代会中工代会是第一个召开成立大会的。我们三个人，孙长瑞调去组建干代会，我和王洪章是组长、副组长。我就提议，把张承明请进筹备组当个副组长，他虽然落选了，但也是一个响当当的工人造反派。上报给支左的解放军后批准了，他也来上任了。我们成立了联合调查组，在全市调查摸底。我的意见是：造反不分先后，在一个单位或一个系统，只要造反组织能联合起来的，就吸收进工代会。调查后，大家开会，确定参加工代会的群众组织，张承明也参加了。所有的系统都顺利通过了，可在“641”也就是现在的大港油田的问题上出了点差头。当时的“641”属于半军管单位，早就被部队保护起来，可也分成两大派，一派是“五一”，另一派是“大联委”。“五一”这派复员军人多，得到部队的支持；大联委是老工人多。两派斗得很厉害，合不到一起。联合调查组的意见：同意部队支持的“五一”，我也同意了。而张承明支持“大联委”，这就产生了分歧。当然是多数人的意见占了上风，最后五一兵团被吸收为工代会成员。

市工代会成立大会于1967年3月15日在体育馆召开，开会那天李雪峰参加了。我们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据说他已经在天津活动一段时间了，也找了不少人谈话，具体要干什么，我们都不清楚。工代会成立大会张承明没有参加，大会结束了，开会的人们走出体育馆，都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只见体育馆周围贴满了大字报，公开打出“打倒李雪峰”的旗号，宣布成立“反复辟”——也就是大联筹的雏形。张承明公开站出来，另立山头，和五代会分庭抗礼。市工代会成立的这一天，标志着天津市两大派群众组织对立的公开化。

大会后，经各系统代表酝酿协商，市工代会的领导班子最后定下：组长林启予（电业）；副组长李荣贵（铁路）、金家瑞（外贸）；成员王洪章（冶金）、王勇（财贸）、姜卫东（房管）、刘晓云（军工）、张连友（一轻）、陈玉泉（新港），一共是9个人。

五代会成立以后，天津一片欢喜，虽然也有一点小乱子，大字报、口头辩论不断，但问题不大，也无妨大局。五代会内部各种观点错综复杂，纠缠不清，还经常搞出一些摩擦。

五代会成立后的第一个大活动，就是3月20日在广场召开批判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大会。每逢开会都是我牵头组织，我在下边要做许多工作，得把五代会统一了，包括各个队伍站在什么位置，不同观点的队伍不能挨得太近，大会谁来主持，都谁参加，发言的次序谁先谁后，如何交叉，标语口号如何制定……当时开大会，喊口号是一个重要程序。开会之前，我就看见江枫把许光黎叫过去，

不知谈了些什么，结果一开大会，第一个动作就是把发言的次序变更了，把陈相文（南大八一八的头）发言排到了最后，下边就有了一些躁动。最要命的就是口号，当时开大会都要反复地呼口号，除了“毛主席万岁”之类的通用口号外，还有结合当时形势制定的一些口号。我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制定的口号是“1·21政法公社夺权是反革命夺权”，并再三叮嘱领喊的人，一定要按这个口号不能变。但是他一喊还是变了，把口号中的政法公社四个关键字给没了，变成了“1·21夺权是反革命夺权”。因为当时参与公安局夺权的单位很多，其中包括天大八一三、南大卫东等等，军管以后，该事件定性为“政法公社反革命夺权”，把社会上的其他参与单位都解脱了。但解脱了并不意味着没参加，总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因此，这个口号一喊，无疑触到了一些人的痛处，那还不炸了锅！学生可不听那一套，主要是天大的，呼啦就涌上了主席台，连喊带砸，把大会给搅了。

铁路系统虽然参加了工代会，但内部摩擦仍时有发生。1967年5月12日夜铁路北站调度所发生了被砸事件。我知道的情况是这样的：5月13日早晨8时许，我去工代会上班，刚到了办公室电话铃响了，是支左联络站总机转来的，说：“三号找你。”接下来就是刘政和我通话，他说：“昨天晚上北站调度所发生武斗，你知道吗？”我说“不知道”。他接着指示我说：“你不许掺和，不许派人支援。”我说：“是。”电话刚撂，李荣贵就带了两个人进了我的办公室，劈头就说：“我们被对立面的人打了，你得派人支援。”我问：“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他说：“昨天晚上。”我说：“那我派人去打谁呀？”他不说话了。我问他：“那你现在怎么办，还有什么要求？”他说要去北京告状。我说：“可以。”于是向市里要了一辆吉普车，又派了姜卫东和管万安和他们一起去北京。姜卫东他们回津后告诉我说，他们和李荣贵等人去了华北局接待站，向接待站人员讲述了调度所被砸，致使调度所指挥失控，火车停运若干小时的经过。这件事情暂时搁置了。

1967年6月19日，正值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发表10周年之际，市里在体育馆召开纪念大会。开会之前，天大、南大已经贴出了打倒胡昭衡的大字报。我跟市里建议，又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最好别让胡昭衡参加，请他回避一下。我已经估计到可能要出问题。当时胡昭衡是市革命委员会筹备组成员，天大要打倒胡昭衡主要是发现了胡昭衡有“假党员”的问题。我的态度很明确，也亮给市里了，胡昭衡的事情我们工代会不介入，由中央定，由市里定。我也嘱咐工代会的人不许贴大字报，不许到外边去瞎议论。但市里就不同意，非要让胡昭衡出席。胡昭衡自己也愿意出席，因为那时的干部也都希望自己能有个“亮相”的机会，表明自己没问题。看到市里不采纳我的意见，我就耍了滑头，跟农代会的翟殿柱说：“我感冒了，明天的大会怕是去不了啦，你去主持吧，你农代会也是五代会的。”翟殿柱不知内情，也乐于出面。许光黎安

排体育学院的体育公社飞舟队的人保护胡昭衡，但是人不多。结果，胡昭衡一上台，会场呼啦一下就乱了，刚稳定些，大会宣布开会，天大的学生就冲了上去，和体育公社的人打成了一片，抢话筒，高呼“打倒胡昭衡”，这就乱了，幸好没有形成武斗，刚宣布开会就不欢而散。体育学院上午吃了亏，心有不甘，下午又组织两辆宣传车，手持棒球棍，到天大叫嚷。天大的学生不甘示弱，把棉被褥用水浸湿，顶着往前冲，拽住一个就臭揍一顿。体育学院的人虽然能征善战，但架不住天大人多势众，结果体育学院的人被打得落荒而逃。

还有一次，天大八一三把南大八一八的人逮走一个，又叫我去要人。我认识他们啊，就在我原先上学时住的那个楼。一看，屁股蛋子上都是眼儿，在一个板上摁上图钉，专往屁股蛋子上打！没有深度，有点渗血。我给接出来送还南大八一八。

这是五代会内部的几次武斗。当然，和大联筹的对立也在不断升级。

五代会成立以后就要准备成立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可两派对立越来越严重。1967年3月下旬，中央要求两派组织到北京谈判，五代会的，大联筹的，还有中间派，都去。我当时在宾馆的后楼办公，江枫在前楼。他的秘书来找我说：“江枫说了，你是五代会谈判代表团的团长，给你们工代会9个名额，其他参加谈判的人你拿一个名单。”名单拟好了，在工代会开常委会通过一下，交上去。正要通过名单的时候，段曙光把我叫出去，他是支左联络站支工组的头儿，他说：“你有三个问题：一、你姐夫是历史反革命（他在初中毕业的时候，统一填表参加了国民党中统，但没干过坏事，已作为一般历史问题结论；反右的时候被打成右派。他去世的时候已经是改革开放的年代，河西区教育局授予他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告别仪式上遗体覆盖着党旗）；二、你爱人是资产阶级出身；三、你岳父曾经被判刑（我岳父是开货栈的，解放后曾为王光英存过货，是易燃品，结果着火了，货物被烧，他因渎职被判三年监禁）。因此你不适合去北京谈判。我们的意见叫白长福去，他也是电业局的，也是工代会的委员。”

我还是顾大局的，其实这些问题在我进革委会筹备组、工代会的时候就已经审查过多少遍了，现在又提出来，肯定是托词，不让我去肯定是另有原因，大概是因为有人认为我是学生，不是纯工人，只是不便明说罢了。（后来我才从一个空军支左的军代表那儿了解到真相，他离开之前来看我，说：“你主要是学生！他们怀疑你有派性，总倾向天大八一三。”）我当时没有回过味儿来，心里虽然不舒服，但嘴上还是挺痛快地说：“行啊，我没意见。”回到常委会上我就宣布，白长福去北京开会，我还有些事情要处理，在家留守，主持工代会的工作。工代会的常委也都相信了，他们不了解上边的意图，都没说什么，名单通过了。1967年3月27日他们到北京去谈判。

会怎么开的我就知道了。4月7日、9日和10日，中央领导人三次接见了参加谈判的代表。陈伯达是主管，据说总理、康生、江青等都出来了。谈判结束，定的调子是：天津市斗争大方向是万张反革命集团，天津的革命委员会暂缓成立，以五代会为基础，继续扩大大联合，把没有进来的造反组织都吸收进来。

丁玉琪是百货公司的职工，党员，他是一商造反派的头头，是财贸系统中另一个山头的代表人物。按照中央的意图，应该把他们吸纳进来，这我完全同意，但是，要在工代会领导层里安排职务却有一定的难度。江枫就曾经问过我：“给他安排个副组长怎么样？”我说不行，中央定的调子是以五代会为基础，财贸已经有了金家瑞，而且是工代会的副组长，我总不能把现有的班子成员都拿掉，把位子都让给他们吧！在工代会支左的是解放军74师的田克华政委，他知道，在对待财贸系统的问题上军队和地方（主要是江枫）的看法不一致，于是就私下对我说：“咱俩去塘沽，躲开是非，财贸的问题咱不管了。”他的主意正中我的下怀，于是我们俩就去了塘沽，走访了天津化工厂、大沽化工厂、塘沽盐场等国营大厂，用了半个月的时间，促成造反组织之间的联合，并吸纳他们进工代会。

从北京谈判回来以后别人都回单位了，我还得继续主持这个摊子。北京开会的调子一传下来，天津可就乱套了。最先开始乱的是和平路，两派的人都去宣传自己的观点，宣传车、辩论车都集中到了和平路，街头辩论，先是嘴斗，到处是辩论声，传单满天飞。和平路是一条商贸街，大联筹在财贸系统势力比较大，结果辩着辩着，大联筹就把和平路给控制了。大标语一边倒，东北角官银号鸵鸟墨水的霓虹灯广告变成了李雪峰的脑袋，满街的高音喇叭不停地制造着对立情绪，五代会的人根本不能去了，一有小股的游行队伍进去，就被手持棍棒的人追着打。

当时整个和平路被大联筹控制着，五代会的人根本进不去。姜卫东是工代会的常委，一天晚上，我们派他去给《天津日报》送个稿子，支左联络站出了一辆罗马吉普，一个当兵的开着。《天津日报》的老楼离和平路很近，办完了事，姜卫东就让司机拉着他到和平路转一圈。他以为自己坐的是军车，到和平路兜风看看，没人敢把他怎么样。走到少年宫，车被大联筹工矿造总铁血团的人扣下了，一看车里坐的是姜卫东，不由分说，就把他从车里揪出来，一顿乱打。大联筹的人让他喊打倒李雪峰，他就是不喊。打完了又当街示众，最后被关押到少年宫里。司机是现役军人，车又是军车，他们没敢动。司机就回来报告了，说姜卫东被人打了，关押在少年宫。我们赶紧找刘政，刘政够厉害，马上通过公安局的专线找到他们，说：“限你们在12点以前必须把人放了，不放我就抓你们，把你们都逮走！”不到12点，11点多吧，来电话了，说人已经放在花园路那边。我们赶紧出车把他接回来，安排在宾馆里，他当时穿了一件短袖衫，身上都是血。刘政又亲自到宾馆去慰问一番。他在宾馆住了一个礼拜。这是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姜卫

东从此名声大噪。

当时李荣贵回单位不露面了。金家瑞单位两派也闹起来，后院着火了，自顾不暇，工代会就剩下我一个人了。没人商量，也没法请示，我就独断专行了。五月初，情况不断反映到工代会，我可就有点急了，说：这不行，和平路必须闯过去！谁再喊喇叭就给我拔掉！有人担心出事，我说没事，出了事我负责。于是组织工代会在海河广场开大会，会后上和平路游行。电业、基建、化工等等，都是能打的，人人头戴安全帽，身穿工作服，手持白蜡杆，在前边开路。上万人的游行队伍，浩浩荡荡，沿和平路向东北角进发。一路上势如破竹，高呼五代会、大联合的口号。白蜡杆撒在地上，齐唰唰发出洪亮的声响。对方有个高音喇叭突然喊起来，马上就有人冲上去给拔掉了。没有人出来闹事，也没有发生打架斗殴，游行队伍非常顺利地走到了东北角。我没有在队伍里，跟几个记者在一边观察，记者们也都觉得非常兴奋，一吐多日积压在胸中的怨气。第一次闯和平路获得圆满成功。这件事完全是我组织的。新华社的记者都是支持五代会的，他们说：“这回可解气了！”上边的领导也乐了。

7月7日又发生了大联筹围攻砸毁3527工厂事件。这是1967年大联筹的一次大行动，也是全市大武斗开始的一个信号。起因是天津市第55中学的两派组织发生了矛盾，一个是红代会，一个是红革会（属大联筹）。3527厂是军工单位，工代会的成员，就在55中的隔壁，支持学校的红代会组织。红革会的人就叫来了大联筹，包括河北大学井冈山、天津市工矿企业无产阶级造反总部、工农学革命造反野战兵团等组织三千余人，一下子把3527厂围住。告急电话就打到了工代会，同时厂里又派专人赶到工代会，请示我怎么办。“人家已经派兵了，我们派不派人？”当时工代会里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主张不正面冲突，派人把厂里的工人安全转移出来。另一种就是主张派兵和他们对打。我当时冷静地分析了一下形势，觉得不能打，一旦打起来，很可能造成伤亡，后果难以预料。于是决定：撤！不正面冲突。我将我们的决定请示了支左联络站的领导，并派出电业和基建的队伍，从工厂的后门将全厂职工安全转移出来。工厂空了，大联筹的人攻了进去，在厂里一通哄抢乱砸，还打电话给消防队，谎称工厂着火了。消防队派出两辆消防车到工厂灭火，被大联筹扣下，把消防车也砸坏了。两派没发生武斗，成了大联筹单方面的行动。7月8日陈伯达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紧急召见天津驻军支左联络站负责人，并指示：“工厂是国家的财产，社会主义的财产，人民创造的财产，你们忍心破坏吗？请你们好好想一想。工人是老百姓，是国家的主人翁，你们可以用对待敌人的办法对待劳动人民吗？要把我的话贴到街上，贴到每一工厂。我上边的话是提醒受蒙蔽群众的。现场不要动，要由五个代表会议组织人去参观。”根据陈伯达的指示，五代会组织各个单位到现场参观。现场得有人保卫

啊，以防大联筹的人再来怎么办？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工代会成立了护厂队、文攻武卫队，是工代会直接组织的队伍，大约有 800 人，保卫展览会。这个厂是解学恭蹲点的厂，由于各造反组织之间的联合搞得很好，没有影响正常的生产秩序。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和李荣贵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明朗了。我们主要的分歧点是：工代会到底应该依靠谁？我主要依靠造反派，他想为一商革联、二商革联要地位。我对他们的态度是：你进工代会可以，但不能吸收为领导成员。李荣贵却希望在领导层里多给他们争取一些名额。矛盾焦点集中在组联组。工代会有一个组联组，负责组织各单位的联合、发放加入工代会的证明。这个组由李荣贵负责管理。组联组的负责人是卷烟厂的张连友，他净给我惹祸。比如说，一个单位有两派群众组织，已经给一派组织发了证，另一派组织也来要证。按道理先不能发了，把两派都叫来，促成联合，然后再统一发个证不就完了？可他呢？又把证给发了。结果两派争得更欢了，都说自己是工代会的正根儿，都来找工代会评理，搞得乱糟糟。气得我就想干脆把他拿掉，让他回单位得了，而李荣贵却护着他。就是这些工作上的分歧吧，惊动市领导了，他们也怕后院起火啊，市革筹的领导就来工代会听取汇报。我和李荣贵各抒己见，市里听了不表态，结论是斗私批修，各自都做自我批评，自己到宾馆去办学习班。

大联筹的表演越来越疯狂，天工八二五就成了大联筹的总部。很多去过那里的人都说那里阴森可怕。我也是出于好奇，想一探究竟。有一天我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去了天津工学院，只见院里冷冷清清，很少有人出入，似乎所有的窗户都用油毡钉死，透不出一丝光亮，让人隐隐约约感到有无数的眼光在盯着院里的每一个人，确实有点瘆人。我不敢进楼，也没敢多呆，只在门口处转了一圈就赶紧走了。7 月 24 日以天工八二五为首的造反组织查封了《天津日报》，8 月 9 日又上演了一出“火烧政师”。那天，我们正在办学习班，任学明来了。他是中学红代会的常委组长。他进门就说：“大林，政校的红代会被人围困了！”政校就是天津政治师范学校，在河北区，学校里两派组织，一个是红代会，一个是红革会，红代会已经是五代会的成员，红革会属大联筹。来人说得邪乎：学校大楼被围困了，他们放火烧楼，有的被打死了，有的跳楼了，有的被强奸了……又是大联筹围攻五代会！根据此情况不支援不行了，任由大联筹嚣张，五代会的人心就散了。箭在弦上，容不得多想。当时工代会的常委都在，李荣贵也在，经大家研究，就看我怎么表态了，我对任学明说：“你先回去吧，我马上就带人过去。”任学明回去，我就去了 3527 厂，我们的队伍在那，其他常委都没提出异议，

河北区是大联筹的天下，为了保证行动的顺利，我事先查看了地图，选择了 609 厂作为立脚点。609 厂在小王庄一带，也是个军工厂，是参加工代会的。我

他们是下午到的，人派过去了，到政校一看，人家那边的围攻已经结束了，楼也烧了，人员也都撤走了。两边没有交锋，我们的人也都撤回 609 厂待命。到了傍晚，609 厂的春雷造反组织就把津京公路给封了。津京公路是通往天津工学院的主要道路，天工八二五当时已经是大联筹的大本营了，把守森严。封路之后还抓了一些人。天津大学的一些学生也参加了围攻政校的活动，围攻之后撤回天津工学院，天大的林红桔带了一些学生去给他们送饭，被封路的工人扣下，带到厂里。干代会的许光黎当时也在场，说：“打他！”我说：“什么？你敢动！你要是敢打人，我可要采取措施了！”厂里那么多人，一打不就乱了？一乱局面就难以控制了。我认识林红桔，她是天大八一三的，比我低一年级。我对她说：“放你走了，赶紧带人回家吧。”把人放了。我的人多，大家都听我的，没打起来。许光黎一赌气走了。我刚处理完天大那档子事，回到楼上的临时办公室，我的司机李月波就跑来对我说：“林头儿，要出大事了，李芝林（化工的一个头头）要把何振武的大筋给挑了！”我问：“在哪？”他说：“就在后边的大院里，你得去看看去。”我赶紧下楼，司机领着我到了后院，然后小声对我说：“看见了吗？那个就是何振武。”只见他光着膀子，在墙根儿蹲着。我说：“这样吧，你去把电业的几个人叫来，把人先放在我的汽车里，派人给我盯住了，谁也不许乱动。”电业的人都听话，这事就处理完了。还扣了一辆大轿车，是天工八二五的一个宣传队，他们是演出回来，走到这里被扣下。可能还有一些，都被关在工厂的食堂里。我去看过，有的坐着，有的蹲着。我问：“他们吃饭了吗？给他们吃饭啊！”回答说：“给了，给了。”

一夜过去了，平安无事。第二天早晨 8 点多钟，六十六军政委杨银生带队来了，有侯再林、苏强，还有几个解放军，找我谈，说：“我、江枫、胡昭衡去天工八二五谈了，他们说你们的人把他们的人扣了。现在江枫和胡昭衡被扣在天工八二五做人质，为了避免武斗，你们得放人。”我说：“没问题，马上放人。”他问：“何振武在吗？”我说：“在。”他又问：“演出队在不在？”我说：“在。”他接着问：“打没打？”我说：“可能打了两下子，但具体的我不知道，我撂下话了，不许打人。”609 厂是做电缆的，厂里的工人一人一个用电缆做的大鞭子。我判断打人肯定是打了，但没什么后果，如果问题严重，早就有人向我反映了。我说：“放！”于是叫人去通知 609 厂的造反派和军代表。先放的宣传队，我说：“杨政委，这就是他们的宣传车，人可是放了。”然后是何振武，“这辆车就是何振武的，放啦。”稀里哗啦，人是都放了。杨银生走了。我也认为没事了，就回工代会了。

中午，大联筹的大队人马就开始围攻 609 厂。怎么打的我就不知道了，是姜卫东代表工代会在那指挥，还有 609 厂的造反派。这是后来听说的。他们开来一辆推土机在前边开道，被 609 厂的工人截下。天机的一个工人又开着这辆反击过

去，谁知推土机半路熄火了，大联筹的人蜂拥而上，把人给打死了。这是死的第一个人。还有一个是641的工人，大联筹的人，攻上来又撤回去，被误认为是五代会的人，也被大联筹的人给打死了。这是死的第二个人。大联筹的人攻上来，609厂的一个工人用自制的土炮还击，他没经验不会用，结果被土炮的后坐力给坐死了。这是在现场死的三个人。609厂告急，要求增派人手。马上组织了一拨人，去609厂支援，走到半路上，被人用小口径步枪射击，打死了一人。没有支援到位。我急了。这时候，也就是8月10日下午，陈伯达和郑维山（当时北京军区的司令员）的指示就到了：“攻打609厂是错误的，动员天津的工人阶级保卫609厂！”指示不是给我的，是通过支左联络站传达到我们这的。据我后来查到的有关文字记录：8月10日下午，陈伯达、郑维山对“609厂事件”作出指示：“你们（指攻打609厂的大联筹）这样做是错误的，错误不要犯得太多了，第一次、第二次是可以原谅的，不要把自己引到没有出路的道路上。我们国家是大好的形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要搞好抓革命促生产，不要做破坏国家财产的事，不要上少数坏人的当。群众力量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是深入人心的，希望你们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当时《革命职工报》1968年编印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第44页）有了尚方宝剑，我的信心更足了，立刻组织了20辆卡车、近千人的队伍，亲自带队奔赴609厂。我坐在第一辆卡车的驾驶室里，对司机说：“你就开车往前走，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你只管给我冲过去。”还好，一路上没遇到任何阻挡，只有一处路障，停车搬开就过去了。李荣贵也用火车调来一部分人马。我们到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1点多了，这时候，609厂已经聚集了上万人的队伍，见到大批援军到来，大联筹的人也不敢再贸然围攻了。这是我亲眼所见，两边的人相隔有三五十米，互相投掷酒瓶、石块，他们又开过来一辆推土机，但推土机里无人驾驶，是定向的，把传达室撞坏一角，把大门撞开，又撞到树上，熄火了。我们在喇叭里反复播放陈伯达和郑维山的指示，见到了效果，大联筹的人渐渐散去。人到了，也没交手。大联筹没有攻进609厂，却把旁边的一个自行车配件厂给抢砸一通。我们的人没砸也没抢，这么多人吃的用的——饼干、面包、罐头、面粉……都是由工代会开具借条，通过正常渠道领取的。

第二天早晨，天津警备区司令员王一来，问了问情况，还问我下一步打算怎么办？我也不知道，就问他有什么意见，他说对609厂实行军管，你们撤出。我说：“没问题，撤出。”上午定下来，下午队伍就开始往回撤。撤的过程当中又出事了。

工矿造总组织的一个人叫张鸿俭，他认为大联筹已经攻下了609厂，就跑到厂门口看热闹，结果被撤离的队伍给逮了。还有一个人是粮食系统的，是工代会

的人，他开着个车在 3527 厂门口转来转去，也被 3527 厂的工人带回厂里。要不说这观点的事情说不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俩人分别关押，一个被关在 3527 厂军代表的屋里，一个被关在职工的更衣室里。这些情况我事先一点也不知道，人太多了，我忙着疏散队伍，解决这么多人的吃饭问题，根本顾不上那些事。一会儿有人来告诉我说，关在军代表室的张鸿俭被打了，我赶紧过去看，挺壮实，五大三粗的一个小伙子，被打得不轻，肩膀上还挨了一刀。赶紧找来大夫给包扎处理，说不要紧。原来回厂以后，不知道这话是怎么传的，说他参加了政校的围攻，强奸政校的女学生里就有他，于是遭到暴打。我还有事要处理，出来的时候对看管人员说：“可不能再打了，再打可就要出事了。”12 点了，又来人说告诉我，人死了。这可怎么办呢？正在着急，又来说后边又死了一个人！“怎么又一个！哪来的？”来人怎么来怎么去跟我讲了一遍。我赶紧去看吧，屋子里一个人也没了。这就赶紧去找军代表，人是在他屋里死的，商量怎么办。军代表姓张，是个连长，他请示了支左联络站后，把姜卫东叫来，让他先找个地方把人扔了，不要放在厂里给大联筹留下口实。于是小姜把人拉到李七庄子，体院那边一片野地里扔了。要说姜卫东这人也明事理，把人扔了以后，他就赶紧给公安局打电话，把死人的经过向公安局报了案。果不其然，第二天，这两具尸体被大联筹抬到市公安局门前，静坐、示威，折腾了一通，后来又成了第二次谈判的一个重要焦点。

七、造反的结局

到了 1976 年初，我表现最突出的是在总理逝世的问题上。为什么要在这里说这个问题？这牵涉到后来对我的审查。

我们接到市里的第一个通知，要求各单位组织好对总理的追悼活动，这个通知没有任何问题。局里马上召开党组会，我在会上做了有关悼念活动的具体部署，并在通知上签了几条意见，明确批示地震局要怎么干。第二天我还没上班，建委就来电话了，要我到建委去开会。建委下属各局的主要领导、一把手都到了。会上没有中央文件，只是念了一个《周总理治丧委员会办公室的通知》。其实这个通知已经下发到了各区县局，大意就是说，不要因为悼念总理的事情影响了抓革命促生产。念完通知，让大家说说想法，大家都不说话，尤其老同志更是一言不发，徐天祥不拿意见，建委也不拿意见。我还是城府不深，结果说话了：“毛主席在纪念张思德的文章里不是写得很清楚了吗？村上的人死了还要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办法来寄托哀思，这是最高指示，还有比这更大的吗？群众有强烈要求悼念总理，我们就要按群众的要求办。群众不要求，那就再说，再引导。”徐天祥说：“小林的意见怎么样？没有意见就这么办吧。”

回到局里，我把办公室主任周杰叫来，他汇报说，总理治丧委员会的通知接到了，你没在，是黄副局长代签的，把咱们开会的决议都否了，按通知执行。问我还看不看。我说，文件我也不看，通知我也知道了，黄副局长的批示现在作废，就按原先我说的意见办。结果，我们在局里开了追悼会，我致悼词，读了报纸上刊登的总理生平，还专门派人往烈士陵园送了花圈。会后，我还让工作人员把总理的相片放大到12吋，一个办公室一张。这个事情处理得蛮好，就是说，我在总理这个问题上没有留下任何把柄。

1978年初，天津的揭批查运动开始。首先批的王曼恬。大概是2、3月份，在干部俱乐部开会，院子里贴了好多大字报。批判会中场休息，我在院里溜达，解学恭也出来溜达，这时候人们都不太沾他了，我年轻啊，解学恭就过来了，我提醒他说：“你呀，一定要注意，王曼恬有自杀的可能，她一自杀你可就说不清楚了。”我这么提醒解是有根据的，因为王曼恬以前曾经自杀过。文革初期，她到北京去见毛主席，结果毛主席不见她，她想不开，就卧轨自杀，幸亏发现及时。果不其然，就在开完会的下午，王曼恬就喝了安眠药自杀，幸亏警卫人员进屋及时发现，抢救过来了。当时王曼恬的市委书记还没有免职，也不能软禁她，怎么办呢？就从天津宾馆找了几个服务员，都是出身好、政审最合格的人，由警务处的处长带着，把王曼恬安排在市委党校。结果她还是自杀了。

那天半夜12点来人敲门，声音十分急促，我去开的大门，来人是警卫处长高云祥，说是有急事要找王中年书记。不大一会，王中年就跟着警卫处长出来，我问：“出什么事了？”他说：“王曼恬自杀了！”顾不上多说就匆匆走了。王中年回来，把事情的过程详细地告诉了我。王曼恬个儿小，给她安排了一个大软床，她把床单的边儿撕下来做成绳索。然后她就给服务员讲故事，讲完故事回到床上，她把绳索拴在床头的横栏杆上，打好结，把头套住，身体往下一溜，吊死了。

接下来就是张继尧（市文教组组长）被停职检查。主要是和王曼恬的关系，及“2·21 接见”的材料是他们整的。

4、5月份市里召开市委扩大会，解学恭“讲清楚”。每个单位的领导班子里都去两个人，一个老的一个新的。上午解学恭做大会检查，下午复会分组讨论，解学恭一屁股坐在我们这个小组里。会议由徐天祥主持，对解上午的检查进行评议。开始有两个老同志先发言，发言都比较温和。我是第三个发言，主要观点是：解学恭有路线错误，江青8次来天津的问题、天津在全国地方党委中提前一天批邓的问题，在悼念总理的活动方面有暧昧的想法。我说：总理对你那真是呵护有加，“2·21 接见”总理保了你，后来上了贼船又是总理保的你，其他的还不知有多少。虽然有这么多问题，但我认为他还够不上“四人帮”的爪牙。解在文革

中没干什么坏事，总的来说，解不是整人的人。我的发言既有批评也有肯定。结果解的检查在我们小组全体通过，并发了会议简报。

关于抢先批邓的事，之前我就听王中年说过。王说，王曼恬听陈相文（此人是市团委书记，后来是团中央筹备组的副组长）说的，陈相文是从北大谢静宜那里得到的消息，又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王曼恬。王曼恬就给解打电话。当时市里的王辉等几个大秘书都说再等等，看有什么变数再说，天津别冒这个尖儿。可解没有采纳，还是提前动了。解在检查中没有提到这些人，只说自己的政治觉悟不高，党性不强，自己把责任都揽下了。

第二天早晨一复会就爆炸了，昨天的会议简报，大概有三四个小组通过了解学恭的检查，大多数没通过。张淮三来到我们这个小组，他当时已经是市委副书记，行政上还没有职务。老家伙们敏感性强，我也感觉到气氛不对了。房管局党委书记李金生第一个发言，接下来是毛昌五，风头急转，调子已经上升到解学恭是“四人帮”在天津的爪牙。揭批了解学恭之后他们问我：“林启予，你的态度变不变？”我说：“我的态度不变，是实事求是的，没有掌握你们所说的那些情况，在工作中也没有发现解学恭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就我所知道的，解不是‘四人帮’的爪牙。”

我当时之所以这样肯定，是有根据的：一是，毛主席批评了江青，解学恭也不是没有行动的。我是从杨拯民那里听说了毛主席批评江青的事。……（编者注：此处删去几句有关《红都女皇》的不准确传闻）江青曾8次来天津，抓小靳庄这个典型，红极一时。当时我刚好到宝坻出差，见到了我的同学，时任县委宣传部长的李绍清，我跟他说：“毛主席批评江青了，你可要小心点儿，过两天市里就该撤工作组了。”我当时真是估计的，没有任何人跟我说过工作组的事。结果市里还真的撤了工作组。通过这一点说明解学恭还是个老实人，是听毛主席话的。二是，解学恭曾对我说：张淮三是1977年底解放的。是胡耀邦亲自给解学恭打的电话：他的历史过去有过结论嘛，先解放了再说。解放后先住了三个月的医院，官复原职，然后市里给他安排了住房，刚好就和我住在一个院。楼上是王中年，他住楼下。地震的时候，当时王中年问我，你的地震棚在哪？我说就在自家的小院里。王说，你不行就搬到我们院来吧。这样，我就在他院里盖了半永久性的临建，搬了过去。现在我们成了邻居。三是，解学恭这个人还不是整人的人，阎达成就是他提名解放的。当年我把搬石头的事都给顶了：陈伯达让“搬石头”，谁敢不听啊？市里开会部署，我遇到了难题就找市政治部段曙光副主任让他转告解学恭：市里有人负责我就干，没人负责我就不干，我不去当这个祸头！解学恭也没有把我怎么样，他是从天津的安定团结出发的。这些说明解学恭是执行中央指示的，不是跟那几个人跑的，怎么是“四人帮”爪牙呢？

继续开小组会，张淮三坐在前边，李金生、毛昌五等轮番发问。第一个抓我辫子的事就是王曼恬的儿子的事，让我说清楚。农代会那个组提出来的，说解学恭通过林启予将王曼恬的儿子安排在总工会。我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给我打电话的人是安淑静（民政局副局长），她的丈夫叫李祥，是杨得志的部下，早年牺牲在朝鲜。她是个寡妇，但是活动能量特别大。她打电话说：“小林啊，王曼恬的儿子，海军的，因为搞对象神经受点刺激，今年要复员了，你们给安排安排。”我说：“我又不是工会头儿，我们头儿是张福恒，你找他去。”她说：“我就找你了。”好吧，找我我就安排吧。我把组织部部长（姓纪）叫来，对他说：“曼恬的儿子复员要到咱们宣传部工作，你去复员办公室把人要来。”事情的过程就是这样，我安排的，跟解学恭有什么关系？为什么非要和解学恭扯到一块？第二个问题就更可笑了，是说我妈去世的问题，我说我不谈，没意思。其他就来了，说王洪文有4辆汽车，你林启予有两辆车。有两辆车倒是不假，其中一辆“上海”是市里配发的，每天上下班都要接送三四个同志一起走。还有一辆北京吉普，是建设部三局赔的，一次车祸我们单位的人一死两伤，对方来人找我们商量，只要不判对方的司机，要什么条件都答应。对方单位妥善安排了死者的家属，丧葬费、养伤的补助费都从优，还把局里坏了的天津吉普换成了北京吉普，一个司机两辆车。

开了7天会，结果两天是解学恭的问题，后来就是冲我来了。他们给我出简报，我也给他们出简报，会上是允许个人发简报的。先是李金生，后是毛昌五，都拍了桌子，我也拍了桌子。在会上我就说了一句大话：“你们不就是想整我吗？整就整！”

会议结束了，天津的班子里只留下吴振和张福恒两个人在家主持工作，其他人都上北京“说清楚”去了。我就说这些老家伙能捕风捉影，有经验！天津干部俱乐部游泳池原先只有常委们才去，领导们一去北京，局长们都来了，毛昌五、刘晓岩、吴毅夫、我等也都去了。毛昌五私下里小声问我：“你说解学恭和华国锋是老乡，华国锋不会给他说好话吧？”我说：“这可备不住。”话就说到这种程度。北京会议之后，解学恭没有回来，林乎加来了，任天津市委第一书记，黄志刚是第二书记。

后来好多人都跟我说，你在会上就多余发言。后来解学恭也这样说，我难以接受，对他说：“你也说这样的话，我心里有点不接受，你在那坐着，我一言不发，装傻啊！我心里过不去啊”话说回来，我就是一言不发，他们能饶过我吗？结果还不一样！

北京会议上市领导决定隔离了三人，徐信、张继尧、李荣贵。李荣贵其他的职务也早已免去，隔离时他只留下一个生产指挥部副主任的头衔。徐信是天津化

工厂的工人，在“十大”的时候，由汉沽区革命委员会推荐，进入到市委的领导班子（任市委副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他的主要问题是：1976 年在北京开全国计划工作会时，他是天津代表团团长，和上海的代表在会上向谷牧副总理发难。再一个问题是在唐山大震时接待华国锋主席，他去塘沽打前站，说话翻来覆去，颠三倒四，给大家的感觉是对华主席的态度“不冷不热”。最后，徐信被开除党籍，回原厂当工人。张继尧被开除党籍，调到天津市教育科学院从事教育研究工作。现已退休。

李荣贵隔离是因为砸北站调度所事件，早在 1974 年天津市选举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时，市革委会在干部俱乐部开会，听取各区县对天津的代表意见时，有农村组和工业组的人反映，李荣贵在文革初期天津铁路北站调度所被砸事件中是恶人先告状，是他们先打了对方一个耳光，并把调度所指挥信号盘推了。在解学恭主持的市革委会上当场询问李荣贵，下面反映的意见对不对？李荣贵都承认了。我还向常委会做了说明，刘政军长怎么给我的电话指示，我是如何派人派车处理此事的等等，全盘托出。解学恭说：当时林启予的职位，这样处理是他的职责。解学恭还是坚持让李荣贵当了天津市的全国第四届人大代表。最后被开除党籍，判处有期徒刑 15 年，因癌症保外就医，于 1986 年病故。

关于其他人，工宣队进驻大学的时候，解学恭、刘政召开了一个革委会委员中的群众代表参加的座谈会，当时毛主席给北京的五大学生领袖打招呼，说：“到你们犯错误的时候了。”还说了“相形见绌”四个字。刘政在会上反复讲这几个字，还点了张承明，点了丁玉琪，点了冯玉田。冯玉田是第二棉纺厂的工人，当年解学恭在第二棉纺厂蹲点的时候发现的，后来作为群众代表进了革委会常委。刘政问冯玉田：“你为什么说你是解学恭的干儿子？说你的自行车是解学恭给的，你到底在宣传嘛？！”说明冯玉田当时就完了。刘政讲完了，于泽光犯愣了，跟刘政叫板：“刘军长，你也是革委会成员，我们也是革委会成员，你有什么权利点人家！”于泽光是南大的毕业生，原先已经被分配到天津五一手表厂下放劳动。会议后，刘政大笔一挥，批示：分配到河北省衡水专区。我们赶紧帮他活动，找到正在天津一饭店开会的解学恭。解说：“这个事现在看来不行了，让他先去吧，没有别的办法。”这很显然就是那么回事。只好去吧。到了衡水，市清查办一个材料转到了衡水，说于泽光整过康生的黑材料。衡水专区根据这个材料就把他打成了“五·一六”分子。此时于泽光正在烟台老家探亲，衡水公安局从烟台将其押回，送进监狱。他现在的老婆当时正和他搞对象，得知情况后给解学恭写了一封信，反映情况。解学恭在信上批示：此材料未经核实，追回。给清查办主任张振江，把信转到衡水，把材料追回来，人放了。出来以后于泽光不想在衡水呆了，跑回天津找我。我当时已经到了 6985 天津铁厂，正在天津办事。于是我

就去找市委的秘书长侯再林，对他说：“把他弄回来吧。”侯说：“弄回来不成，刘军长现在还在位。不如让他先去 6985 吧。”于是我就找王中年帮忙，将他们两口子安排到铁厂。于泽光和李先元的关系不错，李是老红军，后来把他们两口子调回天津。这不自找倒霉，非要拿鸡蛋往石头上碰，落得这个下场。好歹没开除他的党籍。于泽光在铁厂，当时市里就让铁厂开除他的党籍，铁厂打了个报告：“根据我们的调查，于泽光不够三种人，如果市里不相信，请另派人来查，我们就不管了。”这么一项就过去了，党籍保住了。

还有两个造反派杨长俊和许光黎。杨长俊是因他叔叔的问题，他叔叔是六十六军的一个团长，戚本禹的秘书、笔杆子。杨长俊通过他叔叔送过材料给中央文革。许光黎是因为和李雪峰走得近，他曾代表天津体育局和河北省分家，就这样和李雪峰有了关系。林彪事件一出来，李雪峰出了问题，他受到牵连。事后解学恭、吴岱找他们谈话，问题说清楚了，许光黎去体育局任副局长，最后被免职，为击剑队的教练，现已退休。杨长俊被安排团市委，核心小组成员、宣传部长。他在揭批查运动中，被审查了十年之久，以后才安排工作，现已退休。

四届人大开会以后，天津筹备八大。造反派的头儿留在市革委会的就四个人了，我，杨长俊，巴木兰（原市文化局副局长，因曾是张淮三专案组的成员，开除党籍，离休，现健在），还有翟殿柱（原东郊区区委副书记，最后免职，回四合庄公社，现已病故）。

林乎加到天津后，赵武成的夫人苏敏（文教组副组长）在一次办公会议向林乎加提出：“天津要掀起运动（抓三种人）高潮，杀一批，关一批，斗一批。”林乎加参加过北京会议，对天津的情况了解一些，没有听取苏敏的意见，还是按部就班地搞工作。我还没事，但已经有信号，林乎加来，市革委会委员和各部委办领导在干部俱乐部欢迎，王中年给林乎加一一介绍这些人，赵武成挨个和大家握手，到了我这不和我握手，扭头过去了。这时候我就明白了。张淮三检查卫生从河东路经我们单位，我们还到门口去迎接，人家不和我握手，根本不予理睬。

1978 年 9 月份林乎加调回北京任职，天津市委第一书记由陈伟达接任。也就在这个时候，市委派工作组进入市地震局，并宣布我停职审查，说清楚，地震局的所有工作由市工作组代行职权。发动群众揭发我的问题，责令我写检查交代问题，并召开全体员工大会，让我在大会上“讲清楚”。经过一个多月的内查外调，深揭狠批，并没有查出我的重大问题，没搞到能致我于死地的过硬材料。因为地震局是个新组建的单位，绝大多数人对我在文革初期的表现不甚了解。我主持地震局的工作以后，成绩是有目共睹的，特别是在唐山大地震和震后重建工作中，地震局功不可没。其他如在总理逝世的问题上，在“批邓”追查“总理遗言”等问题上，我没有任何过激的举措，只是照本宣科传达上级的文件和指示。我心

里十分坦然，也很清楚，唯一能抓我辫子的就是“609厂武斗”一件事。

八、十年监狱生涯

到了1978年的9月中旬，开始对我动真格的了。一天快下班的时候，我正在局里写检查，市工作组的人骗我说：“奉市里的指示，今天你不能回家了，我们给你找个地方。”我说：“行啊，文件呢？拿来我看看。”他说没文件。我就说：“没有文件我到点可就回家了。”等到5点多了没有，6点多了还没有。“怎么样，文件呢？还没有吧？对不起，我得走了。”我也没客气，下班回家了。10月2号放假在家，工作组的人来家，叫我到局里看文件。到了局里，根本就没有文件，他们就拿出一个假文件，装模作样地向我宣读，说从今天起要将我隔离审查。我想亲眼看看文件，就说：“把文件拿来我看看。”他们不给，说：“到地方再看。”就这样他们把我带到尖山，原河北省遗留下来的一个专门审理高干的监禁所。工作组的人员把我交给看管人员就走了。我找看管人员要求看有关隔离我的文件：“文件呢？给我看看文件。要不凭什么关我呀？”那个看守说：“我们这里是市揭批查办公室专设隔离审查的地方，有人送来我们就收，没什么文件给你看。至于今后的去向，我告诉你林启予，去向就有两个，一个是审查之后问题不大，就放人。另一个就是逮捕你，蹲大狱。”

我在那住一个独间。一个星期过去了，那天晚上工作组组长、规划局的副局长张龙宾来了，向我宣布市委决定：开除我的党籍，依法逮捕。然后让我在逮捕令上签字。我不签，说：“你们凭什么逮捕我？一没有听我的申诉，二没有开支部大会，党章上不是有规定吗？凭什么开除我党籍？！”他们根本不管那套，把我送到市监狱看守所。第二次又让我在逮捕证上签字，我仍不签。不签也行，照样关进去。

1978年11月15日，市建委系统在人民体育馆召开大会，市委第二书记、市革委副主任黄志刚出席，市建委主任毛昌武主持大会，宣布逮捕打砸抢分子林启予，并开除党籍。同时宣布的还有姜卫东、刘忠林、杨振岭，对侯纯民隔离审查。到了12月中旬，又在中国大戏院召开电业系统的批斗大会，把我从监狱里提出来，押到会场进行批斗。对我进行批斗发言的居然有朱光海，四清时清理出来的贪污犯！这本身已经很滑稽了，而他的发言更不靠谱，说我勾结江枫陷害于他！这哪对哪啊？实在是可笑之极！而在当时，为了政治的需要就可以这么胡来。

看守期间主要审查的就是一件事，“609厂武斗”。六处光预审就给我换了6个人。最多的一次来了6个人，是市委的，主要就是引导把“609厂武斗”和王一、解学恭挂钩。我说没有！“609厂武斗”王一、解学恭都没有掺合。王一去

的时候是宣布的军管，让我们撤出。我的态度很明确：有一说一，没有的事决不乱说，我也没有请示过，人家也没有指示。当时那种情况下根本就来不及请示，连陈伯达的保卫 609 厂的指示都是通过支左军代表电话传达的。王一当时在五代会是管我们工业口的，接触得比较多，解学恭根本就不插手，他绝对不跟五个代表会的任何人直接联系，因为都有军代表分管。

在市看守所关押期间，当时有一个信号，《天津日报》发表了一篇黄克诚的文章，黄当时是中央纪委书记。文章我看过了，有一点记得比较清楚，他针对当时一些当政的领导干部说：“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我当时是没有发言权，可你们都是举了手的人。你们应该为此负责任。”还谈了对军队的一些看法。这篇文章发表后，对我的看守有了明显的变化。市看守所的沈所长第一次找我谈话，说从明天开始你可以找家里要书，要东西，随来随接，不受限制。晚上还让我看了电视电影《吉鸿昌》。

11 月 11 日检察院下达起诉书，我在起诉书上写了三条意见：一、聘请辩护人，我的爱人沈鸿芬；二、公开开庭审理；三、电视转播。

1979 年 11 月 30 日第一审。审判长叫邵牧岗。当时已经有律师制度了，不能不让我请辩护人，但又不想让辩护人说话！开庭的头一天才通知辩护人来见我，不事先通知，搞突然袭击，违反了审判程序。我和辩护人谈情况，我们俩达成共识：坚持做无罪辩护。然后给法庭提供了一个有十多人的证人名单，都是军队领导。邵审判长拿着名单从头看了一遍，然后摇了摇头对辩护人：“你们提供的名单上这些人，我连进大门都进不去！”

开庭那天下边坐了六个人，四个女的，其中有两个孕妇，还有两个老大爷，我哥哥去了。我的辩护人以“法院送达辩护时间违犯了法律程序，辩护人要求取证，法官拒受”为由，表示抗议，拒绝出庭。在辩护人缺席的情况下还是开庭了。我在法庭上问：“作为起诉方，检察院的人怎么没来呢？法院既是起诉方又是审判方，合法吗？我现在还是天津市的人大代表、全国人大代表，你们还没有免除我的代表资格怎么就审判我呢？”法官根本就不理你，拿起起诉书就开始宣读，他念一条就问我一句，是否同意，我回答说：“请法官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他念一条，我的回答就是这几个字。念完了，审判长把起诉书往桌上一撂，就说了：“林启予啊，你也别在庭审记录上签字了。不是我非要审你、判你，是市里领导要我审你，判你。”然后就把我送回监狱了。一审就这么判了，以“聚众打砸抢罪”判了我 10 年。

后来我听人说，在研究我们的案子的时候，市委听取汇报，其间张淮三曾经说过一句话：“我蹲了多少年，他们不能少于我！错了再改。”他在监狱里呆了 9 年，按照不能少于他的指示精神，判了我 10 年。

我当然不服，回到看守所就提出上诉。1980年3月高法开庭，这次规模大，搞得隆重。审判长叫赵华峰，5个审判员。还是没有检察院的人到场。这次我们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我爱人把我的人大代表证拿来当庭出示，没用，法官根本不予理睬。然后就开始念判决书。

我就判决书中认定的罪责做了申辩，我的陈述是：

法院认定的“609厂武斗”起因有误。法院认为武斗起因是因为工代会没放
大联筹的核心人物何振武之故。此证仅是何振武自己的证词，更没有其他旁证支持他的书证。我要求证人何振武出庭，当堂对质。放何振武的时候有六十六军的政委杨银生、侯再林和苏秘书（杨政委的秘书）在场，可以证明我们是在武斗之前就已经放了何振武。另外还有大联筹的负责人白金生愿意出庭作证，白金生说：“何振武被放之后没有去天工八二五（大联筹的总部），而是直接去了北京他姐姐家。”

我去609厂是因为接到了天津市支左联络站党委的通知，通知中传达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的指示：攻打609厂是错误的，动员天津市的工人阶级保卫609厂。我是接到领导通知以后，遵照中央指示才去的。

在“609厂武斗”中，工代会方所吃用的东西全部都是通过合法的手续取得的。通过开具介绍信，到有关单位暂借，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由市财政统一报销了。工代会根本就没有砸、抢的行为，砸、抢的行为是对方大联筹所为。

关于死人的事实：法院认定是11人，实际上“609厂武斗”总共死了6人，法院把5个和“609厂武斗”毫不相关的死人也列入其中，连最基本的事实都没有搞清楚。实际情况是：整个武斗过程中死了6个人，工代会一方死的人多，现场死了3个，对方自毙死了一个，还是他们失误造成的。后来在3527厂又死了两个。这两个死亡事件法院另行处理了。对工代会方死难的人我们都做了善后处理，发放了抚恤金。

“一贯的参与文化大革命打砸抢”，我不是一贯的，我只参与了“609厂武斗”，仅此一次而已。而我在文革中大部分工作都是在避免矛盾升级，促成大联合，不是一贯参与文化大革命打砸抢的，更不是屡教不改的。

天津市在文革期间，斗争大方向是万张反党集团，这不是我提出来的，是周总理两次接见天津市党政军领导和群众组织代表时定的调子，市工代会只是执行者，何罪之有？跟我又有什么关系？

说到这，法官不让我发言了。

接下来是我的辩护人沈鸿芬为我做无罪辩护。

首先，她指出，林启予是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天津市人大代表，在没有撤销其代表资格的情况下就予以逮捕、审判，这违背了我国宪法的规定。市检察院作为公诉方只是送达了起诉书，而两审开庭均未到庭，均未当庭起诉，这等于是被告和法院打官司，法院既是原告方又是审判方，不是很可笑吗？以上两点均违背了法律审判程序。

接下来，我的辩护人沈鸿芬用《新刑法》（1980年1月1日起实施）的条文对检察院的起诉加以驳斥：

一、《新刑法》还没有施行，而中法院就已经用《新刑法》来判决了。中法开庭的时间是1979年11月29日，判决的时间是1979年12月27日，均赶在《新刑法》实施之前，这是为什么呢？是老百姓没有法律常识？还是法官没有法治观念？表面上看这只是打了一个时间差，但其中却隐藏着一个阴谋，其幕后的指使者就是当时的市委书记张淮三，他逼着法院在《新刑法》执行前判，而且还指示：“我蹲了多少年，他们不能少于我的年限，错了再改。”这是典型的权大于法，简直就是拿着法律当儿戏！

二、即便是用《新刑法》判决也是违法的。《新刑法》第九条明文规定：1980年以前的行为应按当时法令、政策执行。林启予的行为是1967年的行为，发生在1980年以前。1967年12月1日《中央批准天津市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原文第三条：中央同意天津市双方赴京代表团签订关于《立即、坚决、彻底制止武斗的协议》和《抓革命促生产的协议》，是符合伟大领袖毛主席最新指示精神的。当地驻军和革命群众组织都应采取有效措施，切实保证贯彻执行。其中《彻底制止武斗的协议》主要就是解决了“609厂武斗”的问题，是中央同意了。中央同意，就意味着此事件已画上句号。这就是说，按《新刑法》第九条之规定，1980年以前的行为按照当时法令政策执行，“609厂武斗”事件已被中央认可解决。林启予的行为是接到市支左联络站党委转达中央文革小组领导指示后发生的行为，而且此事件已被中央认可解决，用《新刑法》判决林启予是无法可依的，他的行为是无罪的。

三、1978年中央下达48号文件明确指出：一贯搞打砸抢，屡教不改，情节严重者才予以追究责任。而林启予在中央和市领导的教育下，以后再也没有参与过其他武斗。法院判林启予之罪，也不符合中央文件的规定。

综上所述，林启予保卫609厂的行为是无罪的。

最后沈鸿芬在高法的法庭上理直气壮地辩护：林启予在文革十年中的行为，你们审查了多年，但没有查出他和林彪反革命集团、“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有牵

连的人和事，在文革中没有打过人，也没有指使别人打过人，更没有迫害老干部和群众，没有查出他贪污一分钱的经济问题和生活作风问题。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生活作风上都没有问题，他何罪之有呢？他是一个无罪的人。

休庭的时候，审判长让我爱人去打饭，他小声对我说：“别提总理，上边的事就不要再说了。”下午继续开庭。法警把我带到审判庭的门口，先在外边坐等。此时大厅里都是空的，没有人。一会儿大楼里铃声响起来了，人们从各个楼层、各个办公室出来，有的手里拿着毛活儿，有是端着茶杯，有的拿着报纸，这时我就明白了，参加公开开庭的人都是他们法院的。下午主要是律师辩护，赵审判长不干了，审判员也少了，不是5个人了，变成了3个人了。审完了，也没让我签字。

二审没下来，我一直关在小西关监狱，但一直是未决犯，没有正式裁决。这期间还发生过一件事：唐山有一个红卫兵组织在文革中抓叛徒集团，整过一些人，并死了人。在揭批查运动时被逮捕。就这件事胡耀邦（当时已是总书记）曾写过一封信，下面是当时原信的手抄件：

《胡耀邦同志的一封信》

一九八〇年五月十六日

彭真、彭冲同志并火青、江华、于华、文伯、苍壁同志：

五月十日，我已连接到两封群众来信，说的都是涉及公安部门对文化大革命初期犯严重错误的红卫兵应如何正确处理的问题。因此，我感觉到这是涉及到我们党的政策而又没有解决的大问题。所以用书面形式写出这封意见信。

我先简要介绍一下两封来信的内容：

一封是刘鼎同志的大女儿写的，说的是她为北京市公安局处理一个案子很不安。这个案子的简要情况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六中王昌明、陈晓伦、姜华三个当时都是十七、八岁的小青年，都当了红卫兵。大概是一九六六年，刑讯拷打了一个教师，并且确确实实把这个老师打死了。大概是一九六七年，他们三个都受到了逮捕，关了一年半，释放出来，分配当了工人。从释放到去年底，即十年间表现不错，再无犯罪行为。去年十一月，北京市整顿社会治安，把这个案子又重新翻腾，将他们三个人再次逮捕。事后，彭真同志和我都收到了申诉，我们两人都不赞成重新加刑，并明确主张释放。但因为北京市无人拍板，到现在已经五个月，还没有处理。

另一封是从四川亲自来投寄信件的成都机车厂技术员蒋梅修写的。说河北唐山市公安局将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唐山铁道学院学习的四名青年予以拘捕了。这四

个人的姓名和现在工作地点、职务如下：

华永亮（四川成都机车厂技术员）；高化贵（辽宁锦州铁路分局技术员）；徐树成（南京铁路分局技术员）；何多成（西南交大工作）。今年三月又将成都机车厂的江绍成（工程师即写信人的丈夫）逮捕。唐山市公安局为什么逮捕他们五人？信上说了，他们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都犯了严重错误，具体情节则说不清楚，但基本事实还可以看出一个轮廓：

一九六八年三月，唐山市清查杨白反党集团专案组从当时唐山铁道学院抽出了四十多名学生，参加了搞逼供信，这五个青年都参加了，他们在专案组指挥下，对唐山市级机关十几名干部实行了刑讯逼供，并将一名十七级干部于明信同志乱拳打死。几天后，晚上因监护捆绑，另一名干部杨月锋同志又坠楼身死。五人中的四个人也参加了，信上说是跳楼身死（我估计也可能是他们丢下去的）。这两件事当然是很重要的犯罪行为，但是，当时犯这种罪的小青年有多少呀！单这一件案子就再抓起五个，如果全国都仿效唐山市办法，我看再抓一百万也还不清账。单这一条，就要引起全国的震动，破坏全国安定团结的大局。因此，我认为这是一个极大的政治问题。

为什么我们一些同志对上述这类旧账，老是不同意中央同志提出的“宜粗不宜细、宜宽不宜严”的方针呢？依我看，可能主要有两条原因：

原因之一，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我们一大批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跟着林彪、“四人帮”犯罪缺乏历史的全面分析。林彪、“四人帮”之所以能在六十年代后期、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掀起一股弥天盖地的恶浪，首先就是用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手段，利用和煽动青少年那种幼稚无知的狂热，使他们真正相信了我们党几乎所有的老干部、老党员和几百万知识分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而对这批“牛鬼蛇神”当然只能打翻在地，再踏上千万只脚。因此，一切最野蛮的办法都是“最最革命”的行动。为什么我们现在说是一场空前的浩劫呢？说浩劫的理由之一就是枉死了几十万人、上百万人！不同程度参加这一浩劫的有多少人？我估计总有几千万人，伤人致死、致残的参加者，我估计也有几百万人。这几年全党坚定地宣传和贯彻中央团结起来向前看的政策，是深得人心的。但我们有些同志并不了解，还有成千成万的人，因为犯了错误，甚至做了亏心事而心神不安。我不是主张一个也不追究责任，而是主张严格执行中央〔1978〕48号文件的规定，要追究责任的只限于“行凶杀人的刑事犯罪分子，搞阶级报复的地富反坏分子，搞挟嫌报复后果严重，不处理不足以平民愤的分子，一贯搞打砸抢情节恶劣、屡教不改的分子。”这里必须补充的是，群众性的政治运动中杀伤人的不应在行凶杀人刑事犯罪分子之内。总之，群众性的历史悲剧，抓人越少越好，对于一切由于思想认识问题而

犯了罪的人一律以教育方法解决。即使这样办，我们也得花二、三十年的工夫才能愈合我们整个人民在十年浩劫中所造成的裂痕。如果我们稍不谨慎，只能延长我们整个民族的痛苦。不了解这一点，谈不上有什么政治思想觉悟，有什么共产党人的觉悟，那些以为要在平反历史“冤假错”案的同时，不加区别地惩办一切冤假错案和在政治运动中杀伤人的参加者，我看倒是觉悟不高和缺乏觉悟的表现。

原因之二，可能是我们一些同志顶不住受害者的要求与压力。以我这几年亲自出面解决一些案件的实践中，我深深体会这是一个极大的棘手问题，受害的人特别是死者的亲属，对那些迫害的直接参加者，总是苦苦哀求依法惩办的。有些强烈要求者，甚至是我们党内的负责干部，文化程度相当高的知识分子，有些受过冲击或迫害的老同志，重返工作岗位以后，对自己挨过整、挨过打骂，至今仍耿耿于怀，也有意无意地同情甚至支持受害家属的这些要求。要打通这些同志的思想，实在费劲，但是，我们必须说服这些同志，要引导这些同志向前看，顾大局，特别是老同志和文化高的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胸怀要宽广些：要历史的看问题，要把一切仇恨集中到林彪、“四人帮”身上，要认识到当时很多青年缺乏政治经验，他们也是上当受骗的受害者，是林彪、“四人帮”借了他们的手杀的，我们要谅解他们，并使他们在痛苦的经验中受到教育，为四化立功补过。我们的负责同志如能带头做出榜样，就会起很大的示范作用。几年来，有些地方做得好，可惜没有很好地推广。前几天我又碰到一个案子，使我想起并查到《曹操集释注》上的一个故事。我向这个案子的当事人宣讲了，我说曹操真是了不起的人，他能统一中国的一大半，而且能够实现长期的社会安定，原因之一就是懂得如何解决历史的遗留问题。他因为手下一个大官徐宣抓住另一位有才干的陈矫的一个历史问题，排斥陈矫，特地下了一道手令，手令上说：“丧乱以来，风教凋敝，谤议之言，难用褒贬，自建安五年以前，一切勿论，其以断前诽议者，以其非之。”一千七百多年前的一个封建主，出于本阶级的利益，都晓得如何正确处理历史遗留问题，难道我们自称要改造全人类的共产党员连这点本事都没有吗？因此，我主张，广为宣传各种生动的历史经验和现实经验，提高我们各级政治工作的思想水平和工作水平。

除了以上两个原因之外，我认为我们还有必要提高一点警惕性。从大量的事实中说明，我们各条战线的领导班子都还没有调整好，有些领导核心中还有顽固坚持派性的人，甚至还埋藏了个别居心不良的分子。政治部门，特别是掌握了政治工作要害的公安部门也不例外。我经常琢磨，我们队伍中有些人观察和处理问题极不正常，甚至把事情搞颠倒了，譬如说：对抓过去了若干年的违法乱纪案件没完没了，而对现行的违法乱纪行为却不闻不问；对反过去了的特殊化现象津津

乐道，而对纠正现在的特殊化却无动于衷；对处理别人的历史错误调子很高，对处理自己参与的冤假错案却顶着不办；对别人的缺点毛病要求很苛刻，对自己现在的领导工作马马虎虎，甚至阳奉阴违，等等。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过去几年，某些心怀叵测的人，总是接过中央的正确路线、政策、措施，加以歪曲、篡改，以实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现在仍然值得警惕。

用什么办法防止某些人歪曲党的政策呢？最有效的办法之一就是，领导机关千万不要满足于泛泛地讨论和布置工作，而要勤于了解真实情况，通过调查、考察发现问题，发现一个就抓紧核实一个，处理和解决一个，这样就能不断改进工作，转变作风，就能发现好干部，才有可能暴露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的目的和手法，使其不能得逞。

我爱人来探监时带给我此信手抄件，看过我非常激动、欣慰，认为自己的案情出现了转机。但不久才得知，对此信中央有不同的声音，既不能执行，更不能落实。为了缅怀胡耀邦总书记，表达敬佩之情，将此信的手抄稿录下以做纪念。

由于此信在监狱发生过一段小情节：我把此信手抄件给了同性案的狱友传阅了，然后在厕所里烧毁，顺马桶冲走了。我曾嘱咐大家看后千万不要留下任何痕迹。谁知，一个家伙看到文件像得了宝贝，偷偷记在笔记本上了，结果被看守所的人发现了，追查到我身上。公安局六处来了三个副处长提审我，追查文件的来源和下落。我说没有文件，是我老婆来看我时口述的。他们不信，我就让他们念一个文件看我是否能记住。审问没有结果，把我关进独监。又去我爱人单位调查，她说去石家庄出差，人家都公开传达了。天津也都传达到了政协委员。最后事情反映到当时的市委组织部李研吾那里，李研吾批示：查无实据，到此为止。此事算是告一段落。

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我得罪了监狱的领导。我们屋都是未决犯，我、姜卫东、李荣贵，李荣贵后来得了癌症。还有一个刘忠林，也是文化大革命案，是组长。后来又关进一个香港的诈骗犯，判刑3年，刚刚服刑几个月。看管我们的是7分队队长姓唐，此人原是张子善的警卫员，资格老，级别高，职务小。他也知道自己因何受到的牵连，因此把什么事都看得十分开，对我们的管理也比较人性化。一次他和我商量要给一个犯人减刑，让我写个材料。材料报上去，结果没批，他不服，回来和我念叨：“这叫嘛事呢？咱们报的没批，却给香港的诈骗犯减了刑。”我们有意见啊，就和监狱理论，我们这个队长可能也说了一些不在行的话，结果我们这个屋的人全被拆散重组，我被批判，关了独居。

恰好在这个节骨眼上严打开始了。我的案子从1979年开始审的，一直不判。高法的审判长侯慕玑一直不肯在裁决书上签字。他说：“我不签发，我签完了，

以后见到人家的家属，问我怎么判的，我无言以对啊！”一直等到 1983 年严打时把我们一锅烩了，我从“未决犯”变成了实行犯，裁决书也不是审判长签发的，而是审判员。裁决完以后，把我送到河北省深县的前磨头——天津设在那里的那个监狱。

我释放后，才知道在此期间，王一司令员曾写给当时的市委各位书记一封信，写明“609 厂”武斗的经过，以此说明我是无罪的。另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开会时，郑三生（当时是十一届中央委员，济南军区副司令员，原市委第二书记）问张福恒（十一届中央委员，市委常委）：“林启予的案子就这么定了？没有办法了？”深表遗憾。以上两位领导过问我的案情，虽然没有起到积极作用，但对我是个极大的安慰。

我在西监关押期间经历了严打的全过程，这是我在监狱中亲眼所见。举几个例子：这里关了一个宁河县 13 岁的小孩，强奸犯，判 3 年。据说是因为强奸了一个 46 岁的妇女。天大的笑话！第二个，棉一的女工，据说是抓歹徒的英雄，将闯入女澡堂的流氓按在地上，《天津日报》曾大肆宣扬。这个歹徒刚好就被关在我们这个号里，引得全监狱的人都来看西洋镜。该犯先天智障，白痴，又矮又痴呆，他穿最小的号服，衣服袖子都要挽起快一半，裤腿也是挽到膝盖处。他妈妈也是棉一的女工，那天他妈妈去澡堂洗澡，他去澡堂找他妈，手里还拿了一个小的水果刀，结果就成了流氓。再一个就更没法说了，两个人在公园搞对象，有亲密举动，被巡逻队当成流氓抓起来。本来已经解决了，证实两个人确实是在搞对象，有过亲密的行为。后来严打了，又把男的抓进监狱，判了 15 年。有些案件真出奇，抢西瓜的、抢军帽的，都判了重刑关进来了。据说市各公安派出所都有逮捕犯罪分子硬性指标。监狱超员到什么程度？原来犯人都睡床上，后来铺下都挤满了，起来上趟厕所，回来就找不到睡觉的地方了。连监狱的看管人员都满腹牢骚：把重犯、刑期长的犯人都遣送到大西北去了，不但要出钱，还要有民警跟着。监狱里的罪犯技术工人一下子都没了，刑期短的用不了几年就出去了，打乱了监狱里正常的生产秩序。到了大西北，人家不管那一套，凡表现好的马上就减刑释放了，这些人返回城里，衣食无着，继续在社会上游荡，危害治安，警察也不好管。

前磨头监狱属于天津市的编制，五十年代初期组建于青海省，主要用于镇压反革命。后来迁回河北。我在磨头监狱是一大队犯人劳改的积极分子头儿。我也卖了不少力气，帮他们修操场，修灯光篮球场。不知怎么搞的，我去之前，监狱里都是高粱面、棒子面。自打我们去了之后，白面有了，大米也有了。我当头儿从来不克扣犯人，还经常组织犯人打篮球，搞一些活动。监狱的领导也找我谈过话，说：“林启予啊，按你的表现我可以给你减刑，不是我们不给你减刑，就是

我们给你减了，找谁批呀？”有一年过春节，市里来了慰问团，慰问干警。带队的是当时政协的一个领导。随团同来的有一个新华社的记者，非要见我一面。见面后问了问我的情况，然后对我说：“你这个犯人的头儿恐怕当不成了，慰问团的领导说了，这林启予在外面当官儿，怎么进了监狱还当官儿？”果然，慰问团走后，监狱的领导找我谈话：“市领导发话了，说你林启予在外面当官儿，怎么进了监狱还当官儿？看来你这个头儿是当不成了。这样吧，你看看咱们一大队哪好，你随便挑个地方吧。”我们一大队是搞铸件的，我说：“就干统计吧。”搞铸件也就是一上午的活，没我的事，我就看报纸，喝喝茶，到处溜达溜达。到下午两点我上班做记录，到4点多就完事了。我自己还有一个电炉子，想吃什么都可以自己做，买肉买鸡蛋都不受限制，过得满舒服的，确实没受罪。在西监狱管得严，也没有自由，到了磨头可以说是因祸得福了。到磨头还有这点好，一句也不提让我认罪的话，而且也没有剥夺我的选民资格。监狱的领导跟我说：“根据宪法你有选举权，我们给你选民证。”每到有选举的时候都会给我发一张选票，爱选谁就选谁。

1987年这个单位突然撤销，迁回天津的梨园头。高法的一个书记员问我爱人：“林启予是不是在文革期间参加过学习班？如果参加过，可以顶刑期。”我在1985铁厂工作期间还真的参加过学习班。我爱人把证明开来，我于1988年1月6日提前释放了，我的刑期本该到1988年10月1日。像我这样因文革中的问题被判刑的，天津一共有36人。而被判刑的人当中，大联筹的人一般被判5年，而工代会的人一般判刑都在10年以上。唯一例外的可能就是张承明了，不但没有被判刑，而且还当了科长。其原因，是在文革初期，张准三在他们厂关押期间，他招待周到，在揭批查运动中他逃过了一劫。

所以啊，通过这段监狱的生活，我一直在想，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起来造反是错吗？粉碎了“四人帮”，人民终于有望过上安定的生活，举国欢庆，大好形势下，难道就不会有人继续制造冤假错案吗？市委书记张准三文革初期受到批判、关押，让人同情，可一旦翻过手来，又利用自己的权位，无视法律，瞒天过海，继续制造新的冤假错案，难道这不是文革思潮的延续吗？张准三是一个报复心理极重的人，我再举一例来证明我的说法：江枫是原公安局的局长、市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被“四人帮”迫害致死。文革后，罗瑞卿复出，极力主张为江枫同志平反，却遭到了市委书记张准三的极力反对，因为江枫在1964年审干期间曾查到过他的一些历史问题。他说：“给他（指江枫）平反了，他成了革命的，我岂不又成了反革命？”他还一直记恨着审干时的事情，耿耿于怀。最终，派了一名公安部的副部长坐镇天津，江枫同志才最终得以平反昭雪。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研吾参加了江枫同志的平反大会。

我体会到了什么叫冤假错案！哪朝哪代都一样，谁当权了都是这一套！出来以后，监狱这 10 年我跟谁也不提，不能提，提了也没用，只能自己去消化。我自己也想明白了，政治这东西就是不讲理，用你的时候你就是年轻有为的干部，不用你的时候你就是一堆臭狗屎！人就是这个意思，刘少奇这么大的人物又怎么样？还不是说完就完了！还是邓小平为他平反了。说实在的，监狱这段生活我是有收获的，就是把身体弄好了，业余爱好打篮球成了我救命的机遇。我爱打篮球，比他们多打了几年，他们都爱看我打球，我也天天组织大家打球，给他们当教练，组织全监狱的篮球队。我往球场上疯，什么烦恼都忘了，解放了思想，把心情调整好了。再有，我每天早上没事，就去跑步，锻炼身体，出门就是澡堂子，洗完澡就睡觉，身体保养好了。我原先有心脏病，早搏、间歇，还有痔疮，到现在什么病也没有了。

出了监狱，到地震局去报到，因为那时市委只宣布开除我的党籍并未开除公职，地震局安排我在张道口做检测员。正值改革开放，时机与政策都很好，我就办理了停薪留职下了海。在这中间徐天祥（大无缝总指挥，曾在市地震局工作时是我领导），武明（建工局党委书记，在 6985 工作时我的同事），徐景树（武清县县委书记，市党校学习时我的同学）都给了极大的支持与帮助，我发自内心的感激他们。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对那些在我落难中，对我及家庭及子女给予精神上、物质上援助的领导、朋友、同学都要表达衷心的感谢，他们有：杨拯民（全国政协副主席）、聂璧初（市长）、李文夫（市政局党委书记）、吴毅夫（市基建政治办主任）、李红军（民航学院书记）、张福恒（原市委常委）、李涛、于泽光、周少华（周荣鑫之女）、王建英、侯纯民、白启荣、南新国（南汉宸之子）等人。还有和我共同经历磨难的沈鸿芬，在我落难十年中她牺牲了最美好的年华与我共苦，对这个家做出了贡献，我由衷地钦佩她。

2011 年 4 月